

# 明代皇帝的詩歌創作與傳播

## ——以明太祖、仁宗、宣宗、世宗為論述中心\*

連文萍\*\*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 摘 要

明代皇帝多寫有詩歌，但對詩道的雅好與研求程度不同，本論文透過皇帝詩歌及相關史料，發掘明代皇帝在日常抒懷、宮廷節慶、外交內政等多重應用。詩歌為君德帝業的妝點，寫作四言詩及樂府，意在追摹《詩經》及古聖王述作傳統，五、七言古詩及律絕則多用以抒情言志。惟因囿居宮廷，題材有限，又刻意經營帝王氣象，以致多成習套。明代皇帝詩歌的傳播管道，有刊鈔、刻石、史籍著錄、詩選選錄，及稗官小說之談，然管道多樣亦不能保證傳世，所以詩集亡佚者多，詩作真偽相參。對於臣民而言，並不在乎皇帝詩歌真偽或文學性，而多視為軼聞奇談，是窺探天顏的管道。

**關鍵詞：**皇帝，宮廷，詩歌，詩學，傳播，明代

---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明代宗藩詩歌研究」(NSC 98-2410-H-031-053-MY2) 的部分研究成果，並承蒙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僅此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ping@scu.edu.tw

## 一、前言

明代歷任皇帝多寫作詩歌，著有詩集，如明太祖朱元璋 (1328-1398) 有《御製詩集》，明成祖朱棣 (1360-1424) 有《御製集》，明仁宗朱高熾 (1378-1425) 有《御製詩集》，明宣宗朱瞻基 (1398-1435) 有《宣宗詩集》，明英宗朱祁鎮 (1427-1464) 有《御製詩文》，明憲宗朱見深 (1447-1487) 有《憲宗詩集》，明孝宗朱祐樞 (1470-1505) 有《孝宗詩集》，明世宗朱厚熜 (1507-1567) 有《御製詩賦集》，明神宗朱翊鈞 (1563-1620) 有《勸學詩》。<sup>1</sup> 又如明惠帝朱允炆 (1377-1402?)、明武宗朱厚照 (1491-1521)、明思宗朱由檢 (1611-1644) 亦有詩作，只是並未成集。<sup>2</sup> 因此，皇帝詩歌已蔚為醒目的創作系統，與士人庶民之作共同蒼萃為時代之聲。然而，皇帝詩歌與庶民仍有異同，不惟個人情志抒發，還因政教諸需求，有其獨特內容表現及傳播涵意。此外，皇帝詩歌是否廣傳民間？甚至進入當代詩歌閱讀與品評系統，被普遍接受、評選？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目前學界對明代皇帝詩歌已有注意，然多集中討論明太祖、宣宗少數特定皇帝，或明初君臣唱和文壇生態。<sup>3</sup> 本論文結合詩歌創作與傳播接受的角度，透過正史、筆記、別集等史料，蒐求明代皇帝詩作及相關紀錄，以勾勒皇帝詩歌在日常生活、政教施用的表現，詩歌形式、傳播接受等的特色。惟因相關史料零散佚失，特別是明代歷任皇帝的詩歌興趣、詩集存佚俱有不同，故本論文以詩集現存或相關紀錄較多的明太祖、仁宗、宣宗、世宗為論述中心，兼及其他皇帝詩作，使未有較多詩作紀錄的皇帝，仍能被考察，藉以一探明代皇帝詩歌創作概貌及其閱讀迴響。

<sup>1</sup> 《明史》著錄明太祖、仁宗、宣宗、憲宗、孝宗詩集及神宗《勸學詩》，《列朝詩集小傳》著錄明成祖詩集，《明詩綜》著錄明英宗、世宗詩集。張廷玉等纂，《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 99，〈藝文四〉，頁 662；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乾集〉上，頁 2；朱彝尊，《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70），卷 1 上，頁 9、11。

<sup>2</sup> 如《列朝詩集》著錄明惠帝詩歌，《明詩綜》著錄明思宗詩。錢謙益，《列朝詩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2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清順治九年（1652）汲古閣刻本），〈乾集〉，卷上，〈建文惠宗讓皇帝〉，頁 286；朱彝尊，《明詩綜》，卷 1 上，頁 14。

<sup>3</sup> 如趙中男與劉秀紅均論及明宣宗詩歌，郭萬金討論皇帝的詩歌興趣與文壇生態。整體而言，明代皇帝詩歌的研究仍有待開展。趙中男，〈宮廷詩人朱瞻基的作品及其藝術成就〉，《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7.1（永州：2006），頁 76-81；劉秀紅，《明宣宗與宣德詩壇研究》（長沙：中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8）；郭萬金，〈明代文學生態與帝王的詩歌態度〉，《求是學刊》，36.4（哈爾濱：2009），頁 112-117。

## 二、明代皇帝詩歌的日常抒懷與生活紀錄

明代立國，以興復傳統文化為責任，詩歌創作為皇帝須具備的基本語文能力，自幼即予教習。<sup>4</sup> 但歷任皇帝的寫詩興趣與才具有所不同，樂於寫詩的皇帝多集中於明初，尤以明太祖、仁宗、宣宗最著稱，詩歌是他們記錄日常聞見和感懷的最佳工具，其後的皇帝則多半難以紹承乃祖。以下就詩集保存較完整、詩作能呈現較多私生活面向的明太祖、仁宗、宣宗進行論述。

明太祖喜好詩道，解縉 (1369-1415) 謂：「臣縉少侍高皇帝，早暮載筆墨楮以俟，聖情尤喜為詩歌」。<sup>5</sup> 以《明太祖文集》觀之，全書二十卷，詩歌佔二卷，流傳數量偏少，只能看到詩作概貌。其現存詩作以寫景居多，如〈新雨水〉：「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潤九垓。楹外近聆新水響，遙穹一碧見天開。」<sup>6</sup> 描繪新雨之來，頗見動感，並刻意經營恢宏景觀與響亮音節，以塑造帝王氣象。鍾山尤為日常寄情的對象，如〈鍾山二首〉有「松聲細入耳，雲生水石邊。敲竹猿長嘯，臨崖視鹿眠」之句，<sup>7</sup> 可見其體察狀寫頗有細膩之處，惟描摹仍顯造作，感慨亦未能深沉。

明太祖亦寫僧侶、寺廟題材，此與出身經歷有關，如〈思遊寺〉謂「雨落黃梅麥已秋，日思精舍夢還遊」，<sup>8</sup> 能見憶往之情。晚年則有撫今追昔之作，如〈詠京師〉云：「臣民推戴號神京，嘆息驅馳行五行。轉戰群雄機尚記，帥征英俊量方平。如今已足勳功賞，向後無知孰永名。暇日試將銅鏡照，烏髭堪比玉垂纓。」<sup>9</sup> 追憶草創維艱，欣喜帝業已成，但帝王老矣，多有歲月流逝之慨。

明仁宗因情性所近，自幼即有述作，《御製詩集》分上、下卷，以詠物詩居多，包括詠梅、竹、馬、飯、羹、扇等，可見宮廷物質文化的豐富。其詩能細心察見生活情趣，實則難掩宮廷門牆囿限，如〈新竹〉：「嫩葉含清露，娟娟出短牆。

<sup>4</sup> 關於明代皇帝的詩歌啟蒙教習，參連文萍，〈明代皇族的詩歌教習及其意義〉，《高師大國文學報》，22（高雄：2015），頁 1-28。本文後收入連文萍，《詩學正蒙——明代詩歌啟蒙教習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5），頁 171-209。

<sup>5</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乾集〉，卷上，〈太祖高皇帝〉，頁 284 引解縉之言。

<sup>6</sup>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0，〈新雨水〉，頁 228。

<sup>7</sup> 同前引，卷 19，〈鍾山二首〉，頁 218。

<sup>8</sup> 同前引，卷 20，〈思遊寺〉，頁 229。

<sup>9</sup> 同前引，〈詠京師〉，頁 222。

錦苞初褪綠，粉節尚凝香。音拂薰風細，影飾新月涼。丁寧無剪伐，會見集鸞凰。」<sup>10</sup> 由發現、觀看、聆聽，並以鳳凰翔集的典故，寄寓盛世的自期。又如〈扇〉：「揮扇獲清風，君恩亦與同。豈惟懷抱爽，解慍及寰中。」<sup>11</sup> 藉扇起興，以施恩天下作結，雖是帝王口吻十足，但與〈新竹〉俱囿於小景小物，寫作手法雷同，難以更顯深刻。詠物之外，節令風物最能引發明仁宗的詩興，惟諸詩描摹景物雖有變換，結句則出一轍，如〈初夏即事〉以「天氣清和候，佳興宜高吟」作結；〈秋晴〉的尾聯：「撫景發清詠，庶以歌太平」作結。<sup>12</sup> 以詩歌抒發佳興，吟詠熱情與詩人無異，然「宜高吟」、「歌太平」諸語，構思字句均見習套。

明仁宗描摹親子互動之詩，則透露他對子女的深厚關愛，是帝王詩歌少見的家庭題材。如〈喜女入學〉謂：「秀質天姿異，靈根宿世栽。飄然出群類，好是月中來。」<sup>13</sup> 明仁宗有六個女兒，<sup>14</sup> 雖無法確知係為那一位所寫，有女初長成的喜悅仍表露無遺。〈古詩示諸子免問安禮〉則云：

吾疾今已愈，諸子憂得寧。暫免問安禮，禁忌守醫經。  
趨報爾慈親，喜氣滿宮庭。殷勤告爾曹，謹疾在攝生。<sup>15</sup>

此詩可就兩點考察：一是明仁宗以詩歌作為親子互動的媒介，顯見他的親切慈愛，及對詩歌的多元應用。一為明仁宗多病，「體肥碩不能騎射」，<sup>16</sup> 此詩寫出病後心情，亦見帝王的健康牽動著宮廷的悲喜。明仁宗還有多首用藥詩作，如〈答人索藥〉：

五月合期過，殊膏應盡無。病根從口入，殃咎作身瘡。  
依候宜加慎，順時當自圖。若能聽此訓，免使索醫扶。<sup>17</sup>

<sup>10</sup> 朱高熾，《御製詩集》（國家圖書館藏明洪熙元年（1425）內府刻本），卷上，〈新竹〉，頁13。

<sup>11</sup> 同前引，〈扇〉，頁5。

<sup>12</sup> 同前引，卷下，〈初夏即事〉、〈秋晴〉，頁9。

<sup>13</sup> 同前引，卷上，〈喜女入學〉，頁6。

<sup>14</sup> 蹇義等纂修，《明仁宗實錄》，收入董倫等纂編，《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明刊本），卷9上，「洪熙元年夏四月丙午」條，頁283-284。明仁宗有六個女兒，分別冊封為嘉興公主、慶都公主、清河公主、真定公主、延平公主、德慶公主。

<sup>15</sup> 朱高熾，《御製詩集》，卷下，〈古詩示諸子免問安禮〉，頁29。

<sup>16</sup> 張廷玉等纂，《明史》，卷113，〈列傳第一·后妃一·仁宗誠孝張皇后〉，頁932。

<sup>17</sup> 朱高熾，《御製詩集》，卷上，〈答人索藥〉，頁22。

此詩將久病良醫的心得，化作諄諄告誡，堪稱語摯情真。至於病中如何消磨歲月，〈病起〉有謂：「臥疾經旬日，工詩學又疏」，<sup>18</sup> 可知是以詩排遣，然顧及詩道又荒廢讀書，令其備感困頓。無獨有偶，其後明孝宗病中也曾誦詩自遣：「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sup>19</sup> 詩中同樣討論到「病根」問題，但明孝宗認為病由心生，顯得較能珍攝頤養。

明仁宗之子明宣宗，自稱「狀元天子」，<sup>20</sup> 詩文書畫兼擅，尤勝乃父。他曾對輔臣楊士奇 (1365-1444) 等人說：

朕在宮中無事時，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亦得  
胸次開豁，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楮筆之類。<sup>21</sup>

明宣宗巡行亦不廢詩筆，曾連夜召楊士奇至帷幄，出示御製詩數篇，謂之：「此朕馬上遣興也」。楊士奇拜觀畢，上命左右取筆，令其賦詩為和。<sup>22</sup>

今觀《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共四十四卷，詩歌即佔三十三卷，<sup>23</sup> 可見創作熱情。其詩多見薔薇、橄欖、雀、鷹、筆等詠物主題，及對都城勝景上林苑、西山等的描寫，〈食藕〉、〈睡起〉、〈晚涼〉諸詩，<sup>24</sup> 亦取諸日常感懷，〈題胡騎圖〉、〈畫鷹〉諸作，<sup>25</sup> 尤見對畫藝留心。此外，〈夜軒觀史〉記錄讀書感懷：「治世昭大道，末途躋險巖。肆觀古載籍，寧不為嗟咨」，而以「煌煌典與謨，萬世以為師」作結。〈焚香讀易〉先言爐香氤氳的情境，再聯想文王、周、孔，詩末自勉「以此力諸行，君道庶可敦」。<sup>26</sup> 這類詩作取材頗隨興，筆法則多由閱讀情境起興，終而聯想帝業、寄託感慨，大抵不脫於窠臼。

<sup>18</sup> 同前引，〈病起〉，頁 6。

<sup>19</sup> 陳洪謨，《治世餘聞》（北京：中華書局，2007），上篇，卷 1，頁 10。

<sup>20</sup> 徐學聚，《國朝典彙》，《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64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明天啟四年 (1624) 刻本），卷 8，〈朝端大政八·東宮〉，頁 383。

<sup>21</sup> 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收入董倫等纂編，《明實錄》，卷 101，「宣德八年四月丁亥」條，頁 2258。

<sup>22</sup> 同前引，卷 112，「宣德九年九月戊子」條，頁 2534。

<sup>23</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4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明內府鈔本）。全書四十四卷，此本存二十六卷。

<sup>24</sup> 同前引，卷 32，〈食藕〉，頁 202；卷 41，〈睡起〉、〈晚涼〉，頁 247。

<sup>25</sup> 同前引，卷 43，〈題胡騎圖〉、〈畫鷹〉，頁 256、257。

<sup>26</sup> 同前引，卷 16，〈夜軒觀史〉、〈焚香讀易〉，頁 181、182。

明宣宗之詠史詩，取材頗多樣，〈班超〉、〈張飛〉、〈謝安〉諸作，<sup>27</sup> 肯定前代名臣良將的忠愛情操。也有由亂臣奸相著筆，如〈李林甫〉檢討唐祚禍難之因，感慨「所以古聖君，輔相需英賢」，<sup>28</sup> 可見其對人才、帝業的懸心。明宣宗對擬寫古詩亦有興趣，主題均見挑選，其〈秋風辭〉擬寫漢武帝之作，<sup>29</sup> 可見對盛世君王的傾慕及自我期許，惟全詩過於粘著秋天風物，內容難於開展，仍有略遜一籌之感。總體而言，明宣宗是現可見明代皇帝詩歌創作數量最多者，在日常生活的興感抒情之外，於政教方面尤有多方施用，將在下文詳述。

### 三、明代皇帝詩歌的政教施用

詩歌與政治的深厚關係自古已然，《毛詩·序》謂：「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sup>30</sup> 說明君王以詩歌推行教化，既為重要使命，亦為皇權君德的彰顯。詩歌也反應施政成效，所謂：「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sup>31</sup> 詩歌足為施政成效之檢驗。明代皇帝的詩歌創作，在日常抒懷與生活紀錄之外，因為政治任務的需求，有多重的使用脈絡與政教功能，使其創作命意、內容風貌別有特色，以下分別論述。

#### (一) 宮廷節慶活動的記錄

皇帝以詩歌紀錄宮廷節慶盛事，為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這些節慶有傳統民俗佳節，如新年、元宵、端午等；有個別的慶典或樂事，如祝壽、落成、出遊、祭祀等，皇帝賦詩都是節慶活動的焦點。而結合詩歌競寫，由儒臣賦詩，皇帝親第高下，尤能增加熱鬧氣氛。明成祖時「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游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曳撒侍從以觀。觀畢，各獻詩歌詞，上親第高下，賞黃封寶楮有

<sup>27</sup> 同前引，卷 18，〈班超〉、〈張飛〉、〈謝安〉，頁 196。

<sup>28</sup> 同前引，〈李林甫〉，頁 197。

<sup>29</sup> 同前引，卷 11，〈秋風辭〉，頁 173。

<sup>30</sup>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十三經注疏》本），〈毛詩序〉，頁 15。

<sup>31</sup> 同前引，頁 13-14。

差，至宣德間猶然」，<sup>32</sup> 成為入載史冊的盛事。

皇帝御製詩歌誦讚佳節，乃宮廷例行盛事，故此類詩歌難以推陳出新。如明仁宗有〈上元觀鰲山詩〉：

盛時調玉燭，佳節燦華燈。象緯當黃道，鰲峰擁帝京。  
金蓮春放早，寶月夜同明。聖壽天長久，謳歌樂太平。<sup>33</sup>

此詩狀寫宮廷富麗榮華，鰲山、寶月相為輝映，有天上人間的聯想，尾聯以聖壽、太平的祝禱作結。明宣宗的〈元宵〉亦展現寶麗富貴之氣象：

鰲峰萬疊翠巍巍，太液澄波一鑑開。寶月光隨仙樂起，金蓮花簇畫船來。  
祥雲縹緲連三島，春氣融和遍九垓。最喜良宵同宴樂，衣冠濟濟總賢才。<sup>34</sup>

詩中鰲山、寶月、金蓮如出一轍，其後以賢才宴樂作結。明宣宗的〈元宵〉為組詩，一寫三首，可見歡愉盛情，也顯示其詩才詩興俱為明代皇帝中較為高出者。明世宗亦寫有元宵詩，嘉靖八年（1529）正月元宵，他命大臣廖道南（正德十六年（1521）進士）應制〈燈詞〉十五首以進，並親賦一詩頌讚佳節：

黃道開蓬殿，青陽溢泰穹。賞春才令節，養志自慈宮。  
珠佩軒車從，霞觴祝頌同。千秋還萬歲，物阜與民豐。<sup>35</sup>

此詩以「珠佩」、「霞觴」諸語妝點富麗榮華，末聯則祝禱千秋萬歲國富民豐。將上述三首元宵詩相較，顯見帝王節慶詩歌無論謀篇造句、氣氛情調均不脫習套，此乃政治需求，也是宮廷詩歌的美學好尚，年年例行寫作，詩歌的文學功能已為次要，重點在成為官方正式文書之一，是歡樂佳節、昇平治世的政治象徵。

宮廷個別的慶典或樂事，皇帝亦會賦詩以示鄭重。如明宣宗詩集有〈宮中生子

<sup>32</sup> 尹直，《睿齋瑣綴錄》，《叢書集成新編》第 8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歷代小史》本），頁 209。

<sup>33</sup> 朱高熾，《御製詩集》，卷上，〈上元觀鰲山詩〉，頁 9。

<sup>34</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 35，〈元宵〉之三，頁 215。

<sup>35</sup>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卷 13，〈應制〉，頁 227。

壽聖母皇太后詩〉、〈代皇太子獻壽歌〉、〈大祀〉等。<sup>36</sup> 明世宗也多有紀錄，嘉靖九年（1530），宮中敬一亭落成，明世宗賜宴儒臣，與之賦詩，今可見所賦〈答張少傅報敬一亭成二章〉。<sup>37</sup> 嘉靖十二年四月，明世宗與輔臣於環碧殿演馬，特作〈癸巳歲孟夏中旬三日演新乘馬至禁郊之環碧殿同張李方翟四輔遊吟二章〉誌慶。<sup>38</sup> 此類詩歌很多，在助興之餘，謳歌太平，祝禱國運，兼有記錄宮廷盛事掌故的實用功能，可視為帝王實錄。

有些宮廷盛事是特意推動的，以詩誌慶亦然。如皇帝多半深居內廷，與百姓社會接觸有限，明世宗為實踐明太祖「衣錦當思織婦之苦，食粟當念農夫之勞」祖訓，彰顯重視農桑、崇儉省廢，故於西苑闢農地、設蠶壇、建豳風亭，由皇帝親自觀稼、皇后親蠶，並搭配經筵，進講《詩經·豳風·七月》及《尚書·無逸》，這是嘉靖十年宮廷最大盛事，在明世亦屬罕見。這系列活動均有君臣觀稼勸農、豳風亭等詩歌以誌，<sup>39</sup> 惟其內容妝點盛世、象徵帝德，實即宮廷娛樂而已，與實際農桑施作、人民生計仍是大有距離。

## (二) 恩寵賞賜的運用

皇帝以詩歌與臣子互動，是治國御臣的巧妙手法，其方式主要有二：一為皇帝賜詩臣子，以示恩寵統御；一為君臣詩歌唱和、交心聯誼。為便利討論，以下先就賜詩寵臣加以觀察。

明太祖善於以詩寵臣，王世貞（1526-1590）即謂：「高帝聖質天縱，其賜群臣詩文，不分貴近，觸意即發，多不可紀。」<sup>40</sup> 其詩集可見〈賜應奉陳溥歸關中〉為送老臣歸鄉，〈遣使為大祀犧牲北至齊魯〉乃恤勉使者辛勞，其〈雨墜應落花賡徐瑛韻〉、〈賡吳喆韻〉、〈賡宋璉韻〉等，則為和徐瑛、吳喆、宋璉（1344-

<sup>36</sup> 〈宮中生子壽聖母皇太后詩〉、〈代皇太子獻壽歌〉見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卷二十」，惟此卷已佚，僅存詩題。〈大祀〉見同前引，卷 34，頁 207。

<sup>37</sup>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 13，〈應制〉，頁 227。〈答張少傅報敬一亭成二章〉，張少傅為張璁，詩見明世宗《御製詩賦錄》，收入張璁，《諭對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刻本），附錄，不分卷、頁，「嘉靖九年十月」。

<sup>38</sup> 明世宗《御製詩賦錄》，收入張璁，《諭對錄》，附錄，不分卷、頁，「嘉靖十二年四月」。

<sup>39</sup> 徐階等纂，《明世宗實錄》，收入董倫等纂編，《明實錄》，卷 123，「嘉靖十年三月己丑」條，頁 2944-2946；卷 129，「嘉靖十年八月丙午」條，頁 3080-3082；卷 130，「嘉靖十年九月戊寅」條，頁 3097。

<sup>40</sup>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0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4，〈賜群臣詩〉，頁 177。



1380) 諸臣之詩。<sup>41</sup> 明太祖以詩寵臣，既是普施皇恩、強化統御，也藉賡和詩韻展現才力。諸臣中，宋璲為宋濂 (1310-1381) 之子，父子多次獲得明太祖賜詩，包括宋濂致仕時〈賜詩一章并序〉、〈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賜和宋璲詩〉等，<sup>42</sup> 只是二人最終難逃貶謫，顯見君主賜詩只為一時之寵，不是仕途恆久保障。

明仁宗在東宮時勤於學詩，每寫成一首，就令徐善述 (1353-1419) 改竄，<sup>43</sup> 其〈擬送徐贊善膏藥〉有「策杖宜勉強，佐予學成詩。良膏贈數枚，效速端可期」諸語，可見君臣情份頗深。〈賜楊士奇體席〉則有「忠愛情深切，思君比虞唐。常懷責難志，氣節凌秋霜」之句，<sup>44</sup> 針對楊士奇提醒「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sup>45</sup> 表示體諒與了解。明仁宗君臣以詩對話，能增進政治之祥和，惟明仁宗年壽所限，未能更有發揮。

明宣宗賜詩尤多。有針對個人賞賜，如〈賜贈太醫院使徐叔拱還鄉詩〉、〈賜太監鄭和〉等，<sup>46</sup> 記錄人際互動。有賞賜眾臣，如宣德四年 (1429) 五月，明宣宗視朝退御文華殿，讀典謨之篇，寫成〈朝退御書殿讀典謨有作示廷臣〉，歷數往古聖王偉業，強調自己「夙夜念在茲」，期盼廷臣「進賢獻忠讜，竭力殫謀為。庶幾懋功采，將追古雍熙。」<sup>47</sup> 由閱讀經書發抒自我帝業理想，要求臣下戮力付出。

明宣宗喜賜食物寵臣，並以詩為紀，如〈賜廷臣榔梅詩〉、〈賜內閣學士新藕詩〉等。<sup>48</sup> 諸詩寫法頗為一致，皆先言物之珍美，最後寄予期勉。其〈賜百官食鱔魚〉即先以「鱔魚出江淮，水族味奇珍」點題，接著形容此魚體貌特性，最後以「群臣實同體，玉食焉敢私。欣戚既不異，甘苦亦共之。一味奚足多，骨鯁以為

<sup>41</sup>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 19，〈賜應奉陳溥歸關中〉，頁 218；卷 20，〈遣使為大祀犧牲北至齊魯〉，頁 226；〈雨墜應落花賡徐瑛韻〉、〈賡吳喆韻〉、〈賡宋璲韻〉，頁 229。

<sup>42</sup> 宋濂撰，羅月霞編，《宋濂全集·潛溪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卷 1，〈賜詩一章并序〉、〈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頁 2288、2290；卷 6，〈賜和宋璲詩〉，頁 2643。

<sup>43</sup> 朱彝尊，《明詩綜》，卷 1 上，〈仁宗昭皇帝〉，頁 4。

<sup>44</sup> 朱高熾，《御製詩集》，卷下，〈擬送徐贊善膏藥〉，頁 19；〈賜楊士奇體席〉，頁 17。

<sup>45</sup> 楊士奇，《三朝聖諭錄》，收入霍韜輯，《明良集六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47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明嘉靖十二年 (1533) 刻本），頁 44。

<sup>46</sup> 〈賜贈太醫院使徐叔拱還鄉詩〉、〈賜太監鄭和〉見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卷二十八」，惟此卷已佚，僅存詩題。

<sup>47</sup> 〈朝退御書殿讀典謨有作示廷臣〉見同前引，「卷十三」。按，此卷已佚，全詩見存於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卷 54，「宣德四年五月癸酉」條，頁 1305-1306。

<sup>48</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 43，〈賜廷臣榔梅詩〉、〈賜內閣學士新藕詩〉，頁 260。

期」，<sup>49</sup> 強調君臣甘苦與共，以忠愍相期。此類賞賜深具政治意涵，是故其後明神宗曾多次仿倣，賜輔臣及講官鱗魚，<sup>50</sup> 惟才力、興趣有限，並未如乃祖以詩為誌。

自號「天河釣叟」<sup>51</sup> 的明世宗，即位初期曾展現寫作熱情，留有許多賜詩紀錄。如嘉靖五年 (1526)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 (1461-1527) 因目疾請假，明世宗賜詩以慰問。<sup>52</sup> 嘉靖十二年十月，禮部尚書夏言 (1482-1548) 進講，御製〈聞講篇〉以賜；御重華殿，又作〈過觀世廟有感〉詩，以素牋書寫賞賜；幸西苑迎翠殿作〈選求翰林詩〉及〈秋日書懷〉，以龍牋書寫再次賜詩，夏言皆恭進和詩，並將賜詩刊石以進。<sup>53</sup> 明世宗連續賜詩單一臣子，自屬榮寵非常，只是帝意難料，夏言之寵不久就被嚴嵩 (1480-1565) 取代。明世宗樂於賜詩，曾思考君臣間詩歌互動的功能，其賜費宏 (1468-1535) 詩謂：

古昔聖王撫方夏，必資賢哲為股肱。君臣上下俱一德，庶政惟和洪業成。顧余眇末德寡昧，欽承眷命歷數膺。宵旰兢兢勉圖治，日御經幄延儒英。每從古訓尋治理，歌詠研磨陶性情。詩成朕意或未愜，中侍傳宣出紫清。補袞卿作仲山甫，為朕藻潤皆精明。……<sup>54</sup>

明世宗取法歷代聖王與賢哲，認為君臣互動不惟在經義治術，也要有詩歌的交流潤改，方是君臣同心同德的實踐。只可惜他對詩歌的興趣，與對國事的作為如出一轍：「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其後則「紛紜多故，將疲於邊，賊訐於內」，<sup>55</sup> 甚且沉迷道教，導致府藏告匱，其詩歌創作亦是先熱後冷、難以為繼。

明代皇帝明思宗，閒暇時喜寫書法，詩非所擅，故不多作，然其〈賜石砮土司秦良玉〉仍頗知名：

<sup>49</sup> 同前引，卷 17，〈賜百官食鱗魚〉，頁 188。

<sup>50</sup> 顧秉謙等纂，《明神宗實錄》，收入董倫等纂編，《明實錄》，卷 40，「萬曆三年七月壬寅」條，頁 920；卷 126，「萬曆十年七月丙寅」條，頁 2347。

<sup>51</sup> 郭子章，《豫章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73），卷 6，頁 281。

<sup>52</sup> 徐階等纂，《明世宗實錄》，卷 65，「嘉靖五年六月壬子」條，頁 1487。

<sup>53</sup> 同前引，卷 155，「嘉靖十二年十月壬申」條，頁 3499。

<sup>54</sup>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 20，〈賜群臣詩〉，頁 178。

<sup>55</sup> 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18，〈本紀第十八·世宗本紀二〉，頁 71。

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sup>56</sup>

秦良玉是四川石砭土司女帥，率師勤王，明思宗召見，賜綵幣、羊酒等，並親製四首詩以旌表，此為其中一首。細究此詩，旨在表彰秦良玉義勇之舉，也極力凸顯君臣上下一德。但「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二句，實難掩皇權趨弱、有君無臣的悲哀。可見明代皇帝賜詩與國運盛衰多有關聯，末世帝王威權、國家氣運俱趨衰微，賜詩之作亦難以撐出帝王格局與氣象。

### (三) 君臣同心的宣示

君臣詩歌唱和、交心聯誼，自古即為帝王治國御臣、匯聚人才之道，如《南史》所載：「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於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sup>57</sup> 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與宋濂等詩酒歡飲，宋濂不勝酒力，明太祖為賦醉學士歌，又命諸臣同賦，明太祖諭宋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安樂太平之盛也」。<sup>58</sup> 此論說明君臣同賦具有多重功效，一示帝王慈惠，一示君臣道合同心，一示盛世太平，詩歌足以「紀盛事而詠成功」，<sup>59</sup> 乃國運昌隆之標誌。

明太祖與宋濂的詩酒賡和，成為皇帝權勢鼎盛的重要象徵。明宣宗時曾駕幸文淵閣，與諸學士飲，並出御製詩俾賡和，當時的詩酒歡會，黃佐（1490-1566）《翰林記》即將之與明太祖聯繫，而謂：

虞廷喜起，卷阿遊歌，其響不聞久矣，至我朝而續。夫燕所以示慈惠也，詩所以道性情也，燕飲賡和之際，而至情藹然，迥出千古，祖宗盛時，上下之交，有如是哉！<sup>60</sup>

<sup>56</sup> 朱彝尊，《明詩綜》，卷1上，〈莊烈愍皇帝〉，頁14。

<sup>57</sup> 李延壽等纂，《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卷72，〈文學傳·序〉，頁1762。

<sup>58</sup> 黃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6，〈燕飲賡和〉，頁75。

<sup>59</sup> 李東陽撰，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卷13，〈文後稿·書讀卷承恩詩後〉，頁193。

<sup>60</sup> 黃佐，《翰林記》，卷6，〈燕飲賡和〉，頁77。

黃佐盛讚明太祖與明宣宗時的宴飲唱和，「上下之交」尤說明詩歌在政治運作中，屬於君臣情感的交流，加入酒精的催化，能發揮細膩的政治效能。

然而，君臣唱和有其條件，上有所好，方能下必甚焉。明宣宗之後歷任皇帝較不熱衷，相關紀錄即少見。至明世宗即位初期，方刻意興復此道，並授意臣下將唱和詩文編集以傳。如嘉靖六年（1527）除夕與楊一清（1454-1530）、謝遷（1449-1531）等唱和，編成《輔臣贊和詩集》；嘉靖七年御經筵，與楊一清等唱和，編成《翊學詩》。明世宗並曾親撰序文，其〈輔臣贊和詩集序〉謂：

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舜歌臯陶賡之，〈卷阿〉之作，周臣頌之。朕非虞周之聖，但喜得忠良，遂取為集，以見同道之義。詩之所關大矣，非吟詠者比，實以求道望治，不覺形諸言也歟。<sup>61</sup>

此序可察見明世宗以虞周之世自許，以君臣賦詩為求道望治之舉，而其對君臣唱和的重視，主要著眼於政治意義，既是繼承自古帝王述作的文藝傳統，又切合現實政教的需求。

君臣唱和必須有皇帝能詩、熱衷詩道為基礎，也有臣子本身才力、詩情的條件，特別是群臣的賡和不只是單純文藝寫作，尤為官場的競技較量。能詩之臣參與君臣唱和備感榮耀，甚而編刊成集，如費宏將親身參與嘉靖五年六月十三日退朝後的唱和，及《輔臣贊和詩集》、《翊學詩》等，彙刊為《宸章集錄》，並謂：

蓋自我聖祖親作〈醉學士歌〉以賜宋濂之後，百年以來，未嘗再見。<sup>62</sup>

費宏將明世宗朝與明太祖、宋濂的詩酒賡和聯繫，可謂頌揚之至，間接表達自己的寵遇。另一位大學士張璁（1475-1539）亦為唱和要員，嘉靖十年隨明世宗於西苑觀稼視穀，唱和之作編入《詠和錄》，<sup>63</sup> 又將明世宗之賜詩，夾帶自己的和詩，編

<sup>61</sup> 朱厚燾，《輔臣贊和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02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清鈔本），卷前，〈輔臣贊和詩集序〉，頁 2-3。

<sup>62</sup> 費宏，《宸章集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92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明藍格鈔本），頁 648。

<sup>63</sup> 《詠和錄》乃明世宗與張孚敬（張璁）、李時等唱和，見徐階等纂，《明世宗實錄》，卷 123，「嘉靖十年三月己丑」條，頁 2945-2946。

為《御製詩賦錄》，<sup>64</sup> 頗有較勁意味。然而詩歌實非張璠所長，因為其自愧不能詩，遂上奏章詆毀費宏等人以「小技」希恩。明世宗雖不詰責，此後卻興趣大減，寫作漸稀。此事在明世已有評論，沈德符 (1578-1642) 在《萬曆野獲編》即嘆謂：「惜為璠輩所撓，使天縱多能，不遑窮神知化耳。」<sup>65</sup>

由另個角度觀察，君臣詩酒唱和亦可能透露負面訊息。如明武宗〈賜大學士楊一清詩〉，寫於正德十五年 (1520) 八月。當時他欲以武功自雄，自稱「威武大將軍」，不理朝政，耽樂嬉游。南巡至鎮江時，駕幸已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私邸，歡宴達旦，即席賦詩，又命楊一清恭和。<sup>66</sup> 明武宗〈賜大學士楊一清詩〉共十二首，充分表露臨幸重臣私邸的歡樂自得，以下二首即可見一斑：

車駕親臨茂社堂，璽書高掛耀龍章。昇平宴罷明良會，盛事流傳萬載香。  
香。(〈鑾輿幸第〉)  
正德英名已遠傳，南征北勦敢當先。平生威武安天下，永鎮江山萬萬年。  
年。(〈上馬留題〉)<sup>67</sup>

詩中，明武宗展示威望、記錄昇平，作為其帝業武功的頌辭，「萬載香」、「萬萬年」之句，雖是帝王詩歌習套，仍見其意欲以詩立言，追求自身的不朽。只是出乎所料，此系列詩歌亦是其「奮然欲以武功自雄」、「耽樂嬉遊」、「自署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的寫照。<sup>68</sup>

是故，帝王如果不學無術、怠墮政事，那麼君臣詩酒歡洽，仍難掩飾荒逸無能。事實上，明武宗之詩無法與言行相稱，在當世就引人議論。正德初年明武宗賞賜臣下的多首詩歌，黃佐《翰林記》即指出，以御製詩恩寵詞臣乃列聖故事，故明武宗亦有奉行，但其御製〈寫懷〉、〈蟠龍〉諸詩，「未敢必其果出於宸衷也」。<sup>69</sup> 黃佐提及諸詩，僅有詩題，未及內容，明武宗也沒有留下詩集，難以檢驗其說，然由詩題窺之，〈寫懷〉為抒發懷抱，〈蟠龍〉則氣象萬千，卻被視為未必出於御製，其評價盡在不言。

<sup>64</sup> 明世宗《御製詩賦錄》，現收入張璠《論對錄》附錄。

<sup>65</sup>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2，〈御製元夕詩〉，頁38。

<sup>66</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乾集〉，卷上，〈武宗毅皇帝·賜大學士楊一清詩〉，頁291。

<sup>67</sup> 同前引。〈賜大學士楊一清詩〉共十二首，每詩各繫標題，本處所引為其中二首。

<sup>68</sup> 張廷玉等纂，《明史》，卷16，〈本紀第十六·武宗本紀〉，頁60。

<sup>69</sup> 黃佐，《翰林記》，卷16，〈賜御製詩文〉，頁211。

明神宗喜愛書法，詩作不多，但曾留下以詩歌御臣的紀錄。萬曆九年（1581）正月，他向群臣展示《玄兔圖》，命各詠詩一首上呈，成為當時盛事。<sup>70</sup> 這項紀錄未明言明神宗是否也有詩作，或此次聯吟活動是否與熟稔宮廷掌故的輔臣張居正（1525-1582）有關，但詩題的選定別有玄機。

玄兔是以奇異稀見，加上月宮搗藥，有長生不老的聯想，因而成為祥瑞的象徵，不僅宜於入詩，還宜於入畫。明代宮廷書寫「玄兔」詩已為傳統，明宣宗即有多首詩作，如〈瑞兔〉有謂：「白玉階前偏有色，紫芝叢畔復無踪。卻懷呈瑞先朝日，皇祖神功萬世隆」，<sup>71</sup> 描摹玄兔特色，寄寓盛世太平的吉兆。明神宗以《玄兔圖》命群臣賦詩，足見其統御的能力日趨成熟，詩題尤有紹承先祖、烘托盛世的用意，可看出明代宮廷內詩歌與政治的細膩運作。

#### (四)外交武功的宣揚

明成祖兼擅文武，惜詩集已佚，不易總體察考。但其題寫之碑詩，仍可見明代皇帝詩歌在外交武功上的施用。

朱彝尊（1629-1709）謂明成祖踐位之後，「靡不親製宸章，勒之豐碣」，故在編選《明詩綜》時，特別收錄其〈勃泥長寧鎮國山詩〉。<sup>72</sup> 此詩是永樂六年（1408）明成祖封勃泥國的後山為「長寧鎮國山」時所寫，全篇四言，共三十六句。由詩中「西南蕃長，疇與王賢。轟轟高山，以鎮王國。鑿文於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休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諸句，可見其以上對下的角度，對勃泥國王嘉許與期勉，也傳達對威權炳耀海外的自得自信。

明成祖的碑詩另有三首，分別是永樂三年所寫〈滿刺加鎮國山詩〉；永樂四年〈日本壽安鎮國山詩〉；永樂十四年〈柯枝鎮國山詩〉。<sup>73</sup> 顯示詩歌在外交上的多元施用，是文武事功遠播的象徵，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即謂：

蓋封外國山者凡四見，皆出睿製詩文，以炳耀夷裔，且詞旨雋蔚，斷非視草解、楊諸公所能辦。因思唐文皇兵力僅伸於漠北，而屈于遼水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被東南古所未賓之國，屬鼎宏文，昭回雲漢，其

<sup>70</sup> 《萬曆起居注》第 2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明末鈔本及民國鈔本），「萬曆九年正月二十二日丁亥」條，頁 118。

<sup>71</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 36，〈瑞兔三首〉之三，頁 224。

<sup>72</sup> 朱彝尊，《明詩綜》，卷 1 上，〈成祖文皇帝·詩話〉，頁 3。

<sup>73</sup> 各詩見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甲籤〉，「卷一上」，頁 7、8。

盛恐萬禩所未有也。<sup>74</sup>

沈德符對此類碑詩評價極高，認為非詞臣所能代筆，並分就空間、時間省視，認為碑詩標誌著空間上的拓展政治權力，及時間上的輝映古今，彰顯出明成祖的事功乃亙古未有。此說雖是臣服於皇權的刻意褒美，但其後明代皇帝立詩碑於海外者，並沒有更多紀錄，顯示明成祖相關詩歌的創作與著錄，可能不僅宣揚外交武功和國威，還兼有向海外宣示帝系正統的意涵。

明成祖之後，皇帝詩歌提及的外交事務，以使節入貢居多。像明仁宗有〈詠諸蕃入貢〉，<sup>75</sup> 明宣宗有〈木邦貢使至〉、〈遣使諭西洋古里蘇門答刺諸國〉、〈朝鮮遣使入貢〉等，<sup>76</sup> 由皇帝親自賦詩以誌，顯見為當時朝廷重視的外交大事。這類攸關外交的詩篇，可以看出明代有少數皇帝曾嘗試涉入或駕馭複雜的外交事務。然留存的詩作不多，此雖與詩歌保存狀況有關，也牽涉國勢強弱與政策取向，但皇帝是否能詩、是否親政仍是關鍵，畢竟此類詩歌遠較單純詠物寫景、節慶唱和，更有聞見、襟抱、筆力、政務熟悉及參與度等要求，是皇帝執政態度與才力的綜合體現。

### (五)內政文治的輔助

明代皇帝以詩歌輔助內政文治，有多元的展現。明太祖有專為祭祀所作的樂章，其中〈思親歌〉由內苑聞見「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勤」起興，藉慈烏的典故寄託孝思，最後感懷親恩「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親。有似不如鳥之至孝精，歔歔歔歔夢寐心不泯」。<sup>77</sup> 帝王藉慈烏表達孝思，古已有之，梁武帝蕭衍(464-549)〈孝思賦〉即有「慈烏反哺以報親」之句。<sup>78</sup> 明太祖延續帝王鼓吹孝道的傳統，其意不僅個人抒情，亦在昭示君德，在祭祀大典播唱此詩，具有標榜孝道、端正時風、樹立典範的政治用意。

明太祖〈詠柳州城戍守〉「城居邊徼壘遐荒，煙瘴盈眸癘氣茫」、〈詠南越〉

<sup>74</sup>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賜外國詩〉，頁15。

<sup>75</sup> 朱高熾，《御製詩集》，卷上，〈詠諸蕃入貢〉，頁18。

<sup>76</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32，〈木邦貢使至〉、〈遣使諭西洋古里蘇門答刺諸國〉，頁200、201；卷35，〈朝鮮遣使入貢〉，頁216。

<sup>77</sup>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12，〈思親歌〉，頁127。

<sup>78</sup> 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20，〈人部四·孝〉，頁375。

「邊邑深隍嵌疊峰，土民食粟扣時春」等句，<sup>79</sup> 將邊邑風土民情納入詩歌，力求拓展多樣題材，只是描摹多出於想像，所以停留在表象描繪，缺乏深刻感人的力道。這類詩作刻意宣示對百姓的關心與體恤，以示皇恩普及邊境，反映出國家創立初期的政情複雜，顯示明太祖對邊邑統治問題的在意。

明太祖〈嘉禾詩〉尤為治國平天下的象徵。此為洪武二十八年 (1395) 九月，北營永清衛之龍門有異莖同穗之嘉禾，是歲即大熟，明太祖特撰〈嘉禾詩〉，並賜予明成祖。<sup>80</sup> 永樂四年 (1406) 二月，明成祖將〈嘉禾〉詩勒石，摹本裝潢成軸，賞賜諸王及大臣，<sup>81</sup> 使嘉禾之詩兼有帝德、統御的象徵。嘉禾的進獻，成為重要宮廷傳統，明仁宗寫有〈嘉禾〉詩，頌讚「九穗涵仁德，連莖兆至和」。<sup>82</sup> 明宣宗初即位，四川茂州守臣進獻嘉禾，因為此舉政治隱喻十足，明宣宗諭以「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sup>83</sup> 然仍難掩欣喜，寫作〈嘉禾〉詩自勉「祖功宗德深培植，惟秉恭勤事繼承」，<sup>84</sup> 隨後各地陸續有嘉禾之獻，明宣宗也樂於寫作不同體裁的〈嘉禾〉詩以資誌慶。「嘉禾」典出《尚書》，是國富民豐的祥瑞象徵，明太祖熟稔《尚書》，<sup>85</sup> 所以嘉禾獻瑞或係刻意推動，其後嘉禾詩的隔代接力續寫，除傳承帝業及詩歌「家學」，尤寄寓君德天應、年歲豐登的多重意涵。

明成祖〈闕里孔子廟詩〉亦為內政文治的見證。此詩係重修孔廟落成的祝辭，全篇四言，共四十句，開頭即頌讚孔子「巍巍元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最後則歸結為「作我士類，育我賢才。佐我大明，於斯萬年」。<sup>86</sup> 由皇帝親製祝辭，乃強化尊儒、尊孔傳統，以貫穿時空的文化聯結，宣示當朝的文化正統性，微妙的是，孔子形同為其政權「背書」，明成祖親撰碑詩，猶如建立了皇位正統的「認證」。

因為此詩巧妙又隱微的象徵涵意，其後明憲宗、明孝宗都有〈闕里孔子廟詩〉，<sup>87</sup> 儼然形成撰作接力。明憲宗的詩寫於成化四年 (1468)，是重修孔廟落成

<sup>79</sup>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 20，〈詠柳州城戍守〉、〈詠南越〉，頁 223。

<sup>80</sup> 解縉，《文毅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嘉禾頌〉，頁 614。

<sup>81</sup> 楊士奇等纂，《明太宗實錄》，卷 51，「永樂四年二月壬申」條，頁 762。

<sup>82</sup> 朱高熾，《御製詩集》，卷上，〈嘉禾〉，頁 13。

<sup>83</sup> 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卷 68，「宣德五年秋七月戊申」條，頁 1596。

<sup>84</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 36，〈嘉禾〉，頁 222。

<sup>85</sup> 明太祖熟稔《尚書》，頗有著述，參連文萍，〈明代皇族的《尚書》教習〉，《書目季刊》，45.2（臺北：2011），頁 1-19。

<sup>86</sup> 陳田，《明詩紀事》，〈甲籤〉，「卷一上」，頁 7。

<sup>87</sup> 同前引，頁 15-16。



的祝辭。<sup>88</sup> 明孝宗則寫於弘治十七年 (1504)，據李東陽 (1447-1516)《東祀錄》，孔廟於弘治十二年遭祝融，故明孝宗下詔重建，落成後即親製祝辭。<sup>89</sup> 明憲宗、明孝宗的〈闕里孔子廟詩〉，都是紹承先祖撰述，有崇尚文治、昭示教化的意義。諸作雖是被動的與孔廟修建有關，但顯然出於政治塑造，吳寬 (1435-1504) 在〈曲阜重修夫子廟碑〉有謂：「於赫皇明，建國十紀。文教誕敷，及遠自邇」，<sup>90</sup> 孔廟的修建，猶如樹立明王朝文治教化的里程碑，皇帝親撰碑詩，希冀立言不朽，並彰顯文化盛業與君德治道。

明宣宗處理內政，以詩歌輔助政令尤為知名。如宣德四年 (1429) 作〈猗蘭操〉賜廷臣，諭以薦賢之道；宣德五年近畿鬧蝗災，戶部遣官捕蝗，其作〈捕蝗詩〉示戶部以「往年捕蝗之官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等。<sup>91</sup> 明宣宗對農村百姓多致關心，乃因其即位前曾隨明成祖出巡農村，即位後又有謁陵之行，<sup>92</sup> 因此有機會與百姓接觸。這些詩作與內政時事貼近，詩前多有詩序，載明書寫動機、時間或背景，增加寫實性，足以作為史料文獻，故均入載史冊。<sup>93</sup>

明宣宗詩歌記錄內政時事，還有頒曆、頒令、授官等，如〈頒曆〉、〈頒赦〉、〈簡庶吉士進學翰林〉、〈選任知府〉、〈減百姓重稅〉。<sup>94</sup> 又有邊務武備，如〈命將理邊務〉、〈兵部奏遣近臣巡邊關飭守備因而有作〉等。<sup>95</sup> 諸詩題材經過選取，意在凸顯君德及勤政，詩題即涵括詩意，詩語平易，文學性雖不高，但與政局時事緊密貼合，以詩存史，可作朝廷史事的佐證文獻。

<sup>88</sup> 成化年間曾兩次重修孔廟，明憲宗詩是第一次重修後所撰。同前引。

<sup>89</sup> 李東陽，《李東陽集》，卷 1，〈雜記·東祀錄·東祀錄序〉，頁 681。

<sup>90</sup> 吳寬，《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補遺〉，頁 794。

<sup>91</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 11，〈猗蘭操〉，頁 174。〈捕蝗詩〉見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卷 67，「宣德五年六月己卯」條，頁 1577-1578。

<sup>92</sup> 永樂七年 (1409)，明宣宗從明成祖出巡，見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9，〈本紀第九·宣宗本紀〉，頁 33。即位之後，宣德五年 (1430) 謁長陵，見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卷 63，「宣德五年二月丁酉」條，頁 1496。

<sup>93</sup> 諸詩除記錄於《明宣宗實錄》，又見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9，〈本紀第九·宣宗本紀〉，頁 34-35。

<sup>94</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 16，〈頒曆〉、〈頒赦〉，頁 183；卷 17，〈簡庶吉士進學翰林〉、〈選任知府〉、〈減百姓重稅〉，頁 187-189。

<sup>95</sup> 同前引，卷 17，〈命將理邊務〉，頁 189；卷 33，〈兵部奏遣近臣巡邊關飭守備因而有作〉，頁 205。

## (六)撫藩示恩的互動

明代皇帝面對棘手的宗藩問題，常以詩歌進行施恩懷柔。如明宣宗有〈贈襄王之國長沙詩〉。<sup>96</sup> 天順四年 (1460)，明英宗因襄憲王朱瞻埈 (?-1478) 上〈恭迎六飛〉、〈恢復九宸〉諸疏，故作〈峴山歌〉、〈漢江歌〉作為嘉賞。<sup>97</sup> 又如蜀藩蜀成王朱讓栩 (?-1547) 仁厚好儒術，日觀經史，作詩屬對皆有程要，明孝宗曾賜詩表嘉許。<sup>98</sup> 皇帝以詩歌恩寵統御，制止宗藩的蠢蠢欲動，其政治作用微妙。

皇帝以詩歌示恩，雅好詩道的宗藩也會以詩歌與君王互動。查閱宗藩詩集，秦藩秦簡王朱誠泳 (1458-1498)《小鳴稿》有〈弘治龍飛歌〉，係明孝宗即位時所恭呈，以「邈綿天統紀弘治，宗臣首倡龍飛歌」，<sup>99</sup> 表達自己是首位來賀的藩王，輸忠之誠溢於言表。此外，據《藩獻記》著錄，唐藩唐成王朱彌錡 (?-1523)，曾向荒佚無度的明武宗呈遞〈憂國詩〉以諷諫。<sup>100</sup> 代藩康悼王朱俊格 (?-1545)「嗜學，善屬文」，曾向明世宗上〈睿宗章聖輓歌〉，明世宗賜予金幣嘉獎。代藩山陰王朱俊柵 (?-1603)，「慷慨喜文，有經世之具」，曾在萬曆二十年 (1592)，因西夏邊境不寧，「奏詩八章，寓規諷憂國之意」。<sup>101</sup> 詩歌成為宗藩彰顯好學賢明、關切國事、宣示忠誠的最佳工具。只是宗藩避禍者多，加上未必皆能詩有學，所以相對於宗藩的族繁人眾，相關的詩歌紀錄並不多。

## 四、明代皇帝詩歌的形式

明代皇帝的詩歌創作與使用脈絡，至少有私與公兩方面：私領域以詩歌記錄日常生活與感懷，屬於較隨興的創作，此與一般士人相類。公領域則襄贊內政、外交、馭臣、撫藩等，屬於國家正式文書，可登入史冊。以下考察明代皇帝所選用的

<sup>96</sup> 〈贈襄王之國長沙詩〉見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卷二十二」。此卷已佚，僅存詩題。

<sup>97</sup> 二詩見廖道南，《楚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48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影印明嘉靖二十五年 (1546) 何城李桂刻本），卷 1，〈皇運內紀〉，頁 317、318。

<sup>98</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乾集〉下，〈蜀成王〉，頁 10。

<sup>99</sup> 朱誠泳，《小鳴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弘治龍飛歌〉，頁 213。

<sup>100</sup> 朱謀埈，《藩獻記》，《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19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明萬曆刻本），卷 3，〈唐藩〉，頁 766。

<sup>101</sup> 同前引，卷 2，〈代藩〉，頁 758。

詩歌形式，由不同角度論述其創作特色。

皇帝詩歌創作與使用脈絡，影響了詩歌形式的選用。如因應朝廷廟堂頌歌的需求，多見四言詩之作，明成祖〈勃泥長寧鎮國山詩〉、明宣宗〈思賢詩〉、明憲宗〈闕里孔子廟詩〉，及明神宗〈畫眉山龍王廟碑詩〉等均為四言。<sup>102</sup> 這些四言詩作，多沿襲擬寫《詩經》〈雅〉、〈頌〉諸作，如明神宗〈畫眉山龍王廟碑詩〉：

於赫龍王，不顯其光。上下帝旁，噓翕無方。為雷為霆，為雲為雨。  
有開必先，靡求不與。我求伊何，黍稷稻粱。爾與伊何，千倉萬箱。  
眉山之下，龍王之宇，迄用康年，穀我士女。<sup>103</sup>

詩中「黍稷稻粱」、「千倉萬箱」、「穀我士女」出自《小雅·甫田》；「迄用康年」出自《周頌·臣工》；「不顯其光」則用《周頌·維天之命》「於乎不顯」之意。<sup>104</sup> 明代士人亦擬作《詩經》，但多是摹寫〈國風〉，如王世貞次子王士驥(1566-?) 寫有〈陟陂〉三章，下署「畏讒也」；〈六月〉三章，係「自傷也」等，<sup>105</sup> 即是摹擬〈國風〉之作，用意在遣懷抒感或憂時諷諫。所以明代皇帝擬寫〈雅〉、〈頌〉，多出於政治任務的需求，一般士人不必寫作廟堂頌歌，擬作自有不同。

古代帝王先賢有樂府述作，明代皇帝多予紹承。如相傳為周成王所作的〈神鳳操〉，此為古琴曲歌辭，又稱「鳳凰來儀」、「儀鳳歌」，以當時鳳凰翔舞，因作此詩以言德化。<sup>106</sup> 明太祖作有〈神鳳操〉：「鈞天奏兮列丹墀，俄翩翩兮鳳皇儀。斂翱翔兮棲梧枝，彼觀德兮直為我辭。」<sup>107</sup> 藉鳳凰來儀所寄寓治道德化的隱喻，表達以治世的自許及對建國功成的自耀。明宣宗亦有〈神鳳操〉之作：「鳳凰之飛兮，翩翩其羽。翱翔千仞兮，覽德而下。茲予為理兮，有志于古。吁嗟鳳凰兮，予思賢輔。」<sup>108</sup> 相較乃祖，尤見對治道德化的自滿，也別出思賢之意。

又有古琴曲歌辭〈猗蘭操〉，亦稱「幽蘭操」。相傳為孔子周遊列國，諸侯莫

<sup>102</sup> 朱彝尊，《明詩綜》，卷1上，頁3-13。

<sup>103</sup> 同前引，〈畫眉山龍王廟碑詩〉，頁12。

<sup>104</sup> 關於明神宗的《詩經》講讀與摹寫，參連文萍，〈明神宗與《詩經》講習〉，《國文學報》，49（臺北：2011），頁65-86。

<sup>105</sup> 王士驥，《中弇山人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明萬曆刻本），卷1，〈陟陂〉、〈六月〉，頁537-539。

<sup>106</sup>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57，〈琴曲歌辭一·神鳳操〉，頁832。

<sup>107</sup> 朱彝尊，《明詩綜》，卷1上，〈神鳳操〉，頁1。

<sup>108</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11，〈神鳳操〉，頁174。

能任，返魯隱居，見香蘭獨茂，與眾草為伍，自嘆生不逢時而作此詩。<sup>109</sup> 明宣宗曾擬寫〈猗蘭操〉，詩前加入詩序指出典故，並謂：「予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詩云：「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眾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sup>110</sup> 此詩運用〈猗蘭操〉自古而來的隱喻系統，以彰顯自我渴求賢才的心志，詩成後賜予廷臣，諭示為國薦賢之意。

因應重要典禮，皇帝須寫作大型樂章，雖有詞臣代勞，但明世宗仍曾親力親為。嘉靖五年（1526）七月，因興獻王朱祐杭（?-1519）世廟將落成，明世宗親製樂章，包括迎神、初獻、亞獻、終獻、徹饌、送神諸曲，以表達孝思。並命大學士費宏、張璁等，更定曲名及商定樂舞之進行。諸臣就興獻王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為尚，及《詩經》「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等記載加以討論。張璁主張隆重其禮，並謂：「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也」，切中明世宗心意，獲得採納。<sup>111</sup> 立興獻王世廟於京師，本即張璁之議：「繼統不繼嗣，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sup>112</sup> 明世宗追尊立廟、親製樂章，乃彰顯骨肉至情及自我君德，而特命群臣商定講論，則有駕馭臣下、宣示皇權的用意，其後演為「議大禮」之爭，實非偶然。

又有楚辭體的頌歌〈峴山歌〉、〈漢江歌〉，明英宗曾加以擬寫。其中〈峴山歌〉：

於皇祖宗，混八方兮。裂土而封，命同姓兮。維予叔父，王子襄兮。襄多山川，甲諸邦兮。有巍者峴，特爾望兮。惟彼峴山，禹所荒兮。垂千萬年，歸我祖宗，不可以爽兮。惟澤日茂，惟德日章，燁有光兮。保茲峴山，樂無央兮。子孫孫子，永無疆兮。<sup>113</sup>

詩中由列祖開國，襄王以同姓而王，到訓勉其子子孫孫永保基業，帝王口吻展現無遺。廖道南《楚紀》對此詩稱頌備至：

<sup>109</sup>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 58，〈琴曲歌辭二·猗蘭操〉，頁 839。

<sup>110</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 11，〈猗蘭操〉，頁 174。

<sup>111</sup> 徐階等纂，《明世宗實錄》，卷 66，「嘉靖五年七月壬寅」條，頁 1526-1528。

<sup>112</sup> 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17，〈本紀第十七·世宗本紀一〉，頁 62。

<sup>113</sup> 廖道南，《楚紀》，卷 1，〈皇運內紀〉，頁 317、318。

粵稽諸古，若大舜〈卿雲〉之歌，文王〈鳳鳥〉之詩，泰和氤氳，溢于帝藻。至治馨香，暢于皇猷。穆哉，其天地之協氣已乎。逮于漢祖〈大風〉之詞，霸心猶在。唐宗〈興慶〉之詠，王跡斯微。虞周之盛，不可及已。惟我皇祖親撰〈鍾山〉之賦及〈閱江〉諸詩，英廟載製〈峴山〉之賦及〈漢水〉諸詠，直可追軼虞休，上媲姬美。故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此大順之極也，豈漢、唐諸君所可企而及哉。<sup>114</sup>

廖道南極度誇耀明太祖、英宗之詩，乃臣服於帝王威權的結果，並非完全客觀的閱讀。但他的評論仍有解讀價值，特別是將明代皇帝之詩與古聖先王之詩連結，形成一個自虞舜到明世的帝王詩歌述作系統，顯示皇帝詩歌在體式選用上具有獨特性，此乃自古而然，明代皇帝的詩歌即興復與延續此一文化傳統。「追軼虞休，上媲姬美」二語，則見明世君臣藉由詩歌意欲超越漢唐、媲美三代的宏志，以是觀之，詩之為用大矣哉。

明代皇帝的近體詩創作，與一般士人無別，多見對唐詩的擬寫與傾慕，並藉以抒發自我感懷。如前文引述明太祖有〈詠李白短歌行〉、〈詠李白早發白帝城〉諸作，歌詠李白其人其詩。<sup>115</sup> 明仁宗有〈擬唐人詩〉五首，<sup>116</sup> 又有〈吟詩〉云：

朝退時多暇，心澄學賦詩。漢唐誠所尚，李杜實當師。

漫寫清新意，閑吟典雅辭。從容理情行，進德此其基。<sup>117</sup>

明仁宗直揭「漢唐誠所尚，李杜實當師」，顯見其喜愛漢魏古詩之外，對李白、杜甫深致折服。明宣宗〈懷李白〉亦有「吾愛李太白，卓有高世才」之語，<sup>118</sup> 可知李白為明初帝王三代共同喜愛的詩人。此類宣示雖僅為少數，仍可窺知明代樂於寫詩的皇帝，對唐詩多所嚮往，與當世朝野學唐風氣互有呼應。<sup>119</sup>

<sup>114</sup> 同前引，頁 318。

<sup>115</sup>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 19，〈詠李白短歌行〉，頁 218；卷 20，〈詠李白早發白帝城〉，頁 231。

<sup>116</sup> 朱高熾，《御製詩集》，卷下，〈擬唐人詩〉，頁 32-34。

<sup>117</sup> 同前引，卷上，〈吟詩〉，頁 12。

<sup>118</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 17，〈懷李白〉，頁 191。

<sup>119</sup> 明代翰林院詩歌館課即以學唐為主，因應應制書寫任務，參連文萍，〈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政大中文學報》，12（臺北：2009），頁 231-260。

由皇帝詩集亦可一窺詩歌形式的選用概況。如卷帙保存完整的《明太祖文集》，收錄樂章六首、五古十三首、七言歌行三首、五言歌行一首、五律三首、五排一首、七律四十四首、七絕五十七首、五絕一首，可知明太祖選寫七言律絕較多，而樂章雖僅六首，卻為大型連章詩篇，如〈大祀文并歌九章〉除九篇樂歌，還包括〈迎神歌〉、〈思親歌〉等，<sup>120</sup> 可見其創作熱情，能親自寫作祭祀頌歌，以示虔敬。

明仁宗的《御製詩集》收錄四言詩一首、五絕四十一首、五律五十五首、五排一首、六言詩三首、七絕五十四首、七律三首、七言歌行六首、詞八首。寫得最多的是五古，共一百首，顯見對五古多有獨鍾，確實是「漢唐誠所尚」。然未留下樂章之作，可能是情性才力所限，也與英年早逝、未及累積更多作品有關。

明宣宗《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帙殘缺，觀其目錄，仍可見各種詩體兼備。其中四言詩六首、五古二五三首、七古三七〇首、五律一三九首、七律四一七首、五絕四十四首、七絕二四七首，還有六言詩二十一首、五言排律十六首，七言排律八首。樂府相對數量較少，只有辭四首、操四首，至如大型樂章的寫作則未見，其原因或與寫作興趣有關，今已不易探究。總體而言，明代皇帝在詩歌形式的選用上，多用五古、七古、律、絕來抒情言志，內容較為多元活潑。至如四言詩、樂府，多用於公領域的寫作，以肅穆莊嚴為尚。而樂章的規模較大，寫作難度較高，僅有明太祖與明世宗留下作品紀錄。

## 五、明代皇帝詩歌的傳播與接受

由前述討論可以察知，皇帝詩歌的讀者頗為多元，至少可分三端：其一，皇帝詩歌的讀者有不特定時空及身分的群眾，如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與群臣詩酒宴飲，宋濂不勝酒力，明太祖賦詩賜之，又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至此也」。<sup>121</sup> 他以詩歌承載君臣相得之樂，意欲穿越時空，將帝業與帝藻俱傳諸久遠。又如明成祖詩歌在海外刊石立碑，預設的讀者不惟超越時空，還包括不同國族及文化背景的群眾。

其二，皇帝詩歌的讀者有特定身分的群體，如明宣宗〈閔旱詩〉以群臣作為讀

<sup>120</sup> 〈迎神歌〉、〈思親歌〉分見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十二、二十。又，卷十六有〈題范寬雪山行旅圖并詩〉，未記入。〈大祀文并歌九章〉則見卷十二。

<sup>121</sup>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4，〈翰林院學士宋濂〉，頁135。

者，強調「予為兆民主，所憂與民同」，<sup>122</sup> 希望群臣能體察同心。其〈減租詩〉則以戶部眾臣為讀者，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sup>123</sup> 責成戶部減租以紓民困。這類詩作攸關民生，向群臣曉諭，既展示關注國事之心，也作為令諭的延伸。

其三，皇帝詩歌有單一、特定的讀者，多半是賜詩或唱和對象，以皇族或臣子居多，獲賜者都感激莫名。如費宏獲得明世宗賜七言古詩，有謂：「臣頓首拜授，捧歸舍寓，妻孥驚喜，親友交賀，以為此乃萬金之至寶，千載奇逢」。<sup>124</sup> 明世宗賜詩張璁，其後王世貞《皇明異典》述云：「世宗賜張文忠詩賦，先後凡二十餘章，皆龍箋御墨，天書煥爛，真傳家之至寶、耀世之盛事也。」<sup>125</sup> 可知受賜群臣對於皇帝詩歌的接受，不在於詩歌內容、情境、美感的領略，而是視為皇恩象徵、傳家至寶。

除了前述三種類型讀者，皇帝詩歌的傳佈管道及傳播效益，亦應深入考索。以下分就詩集刊鈔、詩作刻石、史籍筆記別集著錄、詩選選錄，以及稗官委巷口耳相傳五端加以考論。

### (一) 詩集的刊鈔

明代皇帝詩集多有傳鈔刊刻，此係朝廷例行之事，其傳播效益則被皇帝自身的創作態度與傳播意識所牽動。如明太祖樂於寫詩，但寫作隨興，未必留稿，洪武七年(1374)宋濂等整編明太祖詩文集時，即謂「且當萬機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留稿」。<sup>126</sup> 明宣宗則是傳播意識較強，他除了將自作頌揚祖上的《祖德詩》刻石以傳，還編刊《御製詩集》以自驗詩作情志，其親撰序文即謂：

朕喜吟詠，耳目所遇，興趣所適，往往有作。雖才思弗逮，而志乎正者，未嘗不自勉。蓋人之志必在乎正，而志必因言而可見。間命左右稗錄積歲所作，將以自驗其志，總若干卷。<sup>127</sup>

<sup>122</sup> 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卷 103，「宣德八年六月乙酉」條，頁 2295。

<sup>123</sup> 同前引，卷 88，「宣德七年三月辛酉」條，頁 2024。

<sup>124</sup> 費宏，《宸章集錄》，頁 648。

<sup>125</sup> 王世貞，《皇明異典》，收入張璁，《論對錄》，附錄，卷末，不註頁數。

<sup>126</sup> 朱元璋，《明太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1），〈附錄〉，宋濂〈恭題御製文集後〉，頁 475。

<sup>127</sup>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 3，〈御製詩集序〉，頁 126。

也有皇帝對寫詩未必有心，但為突顯事功，乃藉詩歌以圖不朽。如前述明武宗〈賜大學士楊一清詩〉，充滿自矜自喜，所以這一組詩被特意記載而流傳。

皇帝詩集的刊刻，例由司禮監、經廠主持，藏板於內府，或由內府鈔為鈔本，目的在典藏、賞賜之用。即使在明代中葉以後印刷日漸普及，皇帝詩集亦不會進入民間書肆刊刻行銷的商業系統，以金錢論價、任買家撿擇。然而，既要藏板宮中，維持皇帝詩集的神祕尊貴，又企望傳諸久遠，其實不無矛盾。以明太祖文集為例，朱國祚（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曾指出，與明太祖賡和進詩之臣甚眾，然「今諸臣之作十九無聞，而聖藻長垂宇宙，高矣美矣」，<sup>128</sup> 他注意到君臣詩歌傳播效果不同，認為君王詩歌遠較眾臣傳諸久遠。但事實並不如此，在明孝宗時，閣臣丘濬（1418-1495）已上疏謂：

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工，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也。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雖已編輯刻板、藏於內府，天下臣民得見者尚罕。<sup>129</sup>

丘濬指出明太祖詩文皆出自御筆，卻面臨天下臣民罕見的傳播危機。此疏一入，朝廷有何作為，缺乏記載，明太祖文集的流傳是在嘉靖、萬曆間印刷日易盛行，官員乞請在地方上刊刻，因此強化了傳播效能。明太祖之後的歷任皇帝詩集，雖曾有民間乞請刊刻，如《明世宗實錄》記載明世宗南狩御製詩歌，有地方父老乞求梓行於世，俾家傳人誦，<sup>130</sup> 但多數未有民間刊刻紀錄。

明代皇帝詩集以內府刊鈔為主，到了萬曆年間，內府藏板嚴重缺乏管理，以致面臨傳播危機，劉若愚《酌中志》即謂：

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祕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廚役偷出貨賣。柘黃之帙，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或占空地為圃，以致板無晒處，濕損

<sup>128</sup> 朱彝尊，《明詩綜》，卷1上，〈太祖高皇帝〉，頁4轉引。

<sup>129</sup> 劉健等纂，《明孝宗實錄》，收入董倫等纂編，《明實錄》，卷63，「弘治五年五月辛巳」條，頁1213-1214。

<sup>130</sup> 徐階等纂，《明世宗實錄》，卷223，「嘉靖十八年四月庚戌」條，頁4629。



模糊，甚或劈經板以禦寒，去其字以改作。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滲損，鼠啣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泥片者，放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蓋已什減六七矣。<sup>131</sup>

內府的板刻潦落，顯見明神宗荒廢朝政，導致皇權不彰、國勢衰頹，皇帝詩集亦難以傳承。考察《酌中志》著錄的內府藏板，皇帝詩集僅存《御製詩集》、《含春堂詩》及《恩紀》，<sup>132</sup>《御製詩集》未註明是那位皇帝的作品，難以考論；《含春堂詩》及《恩紀》則是興獻王朱祐杬的詩集，分別寫於就藩前、後。

朱祐杬是明世宗的生父，史稱其「嗜詩書，絕珍玩，不畜女樂」。<sup>133</sup>明武宗崩，明世宗入嗣大統，特意立興獻王世廟於京師，親撰祭祀樂章，已見前述。當時明世宗強力追封生父為睿宗興獻帝，修《獻皇帝實錄》。《含春堂詩》及《恩紀》即明世宗比照皇帝詩集由司禮監刊刻之慣例，其為《恩紀》詩集親撰序文，題為〈皇考恭穆獻皇帝詩集序〉，說明此乃其父於弘治七年（1494）受命分封之國，感念明孝宗之恩，故以詩紀恩，輔臣先前已予刊刻，但因「見其寫與刻不甚精，恐無以昭示不朽」，乃命重刻以傳。序中明世宗還回顧幼年由父親啟蒙學詩的經驗：

朕初承指授，學為詩句。方在幼沖，未有所得。今機務之暇，自《三百篇》至唐宋諸家，皆嘗涉其大旨。間有述作，亦惟陶寫性情，而不敢以是妨國政，且免玩物喪志之尤耳。仰思皇考之教，不可復得，感愴何極。然心聲固存，手澤斯在，朝夕諷詠而玩索之，庶幾其有得哉。<sup>134</sup>

明世宗成長於藩府，由父親興獻王親自啟蒙學詩，產生深遠影響。他也藉此說明自己的為詩態度，強調以詩陶寫性情，而非妨害國政、玩物喪志。這是繼明宣宗〈御製詩集序〉後，明代皇帝另一次宣說詩歌主張。

《含春堂詩》、《恩紀》刊成，明世宗曾賜予重臣及宗藩，以具體行動「昭示不朽」。如嘉靖十一年（1532）四月，將二書賜給禮部尚書夏言；同月，將《含春堂詩》、《祖德詩》等賜給韓藩褒城王朱旭欄（?-1537）；嘉靖十二年將《含春堂

<sup>131</sup> 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卷18，〈內板經書紀略〉，頁157。

<sup>132</sup> 同前引，頁159-161。

<sup>133</sup> 張廷玉等纂，《明史》，卷115，〈列傳第三·睿宗獻皇帝〉，頁943。

<sup>134</sup> 朱祐杬，《恩紀詩集》，《故宮珍本叢刊》明代詩文別集第531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卷前，朱厚燧〈皇考恭穆獻皇帝詩集序〉，頁65。

詩》、《祖德詩》等賜給刑部尚書聶賢等人。<sup>135</sup> 這幾次賜書，《明世宗實錄》均署「從其請也」，然諸人所請，不無體察上意或輸忠的成分。所以《含春堂詩》、《恩紀》雖是明代皇帝詩集中的特例，其刊刻與傳播仍可窺出皇權運作之跡。附帶一提，《祖德詩》為明宣宗之作，全詩九章，載於《明宣宗實錄》。<sup>136</sup> 明世宗時追和此作，編成隔代唱和詩集，由司禮監刊刻，以賜書的方式，將己作與明宣宗之詩一起夾帶傳播，用意堪稱微妙。

皇帝詩集的刊鈔與頒賜，雖有強制的推動力，但畢竟都是小眾傳播，以致到明末，皇帝詩集民間愈發罕見。如錢謙益 (1582-1664) 絳雲樓藏書甚夥，包括難得的《明實錄》，<sup>137</sup> 但所收皇帝詩集，卻只有明太祖《御製詩集》、明宣宗《御製詩》、興獻王《恩紀詩集》、明世宗《御製詩賦集》，及《祖德詩》，<sup>138</sup> 顯見明末藏書家能收藏的皇帝詩集並不多，則其傳播危機不言可喻。

## (二) 詩作的刻石

刻石，是印刷術未發展以前的重要傳播方式，在印刷盛行後仍然可見。明代將皇帝詩歌刻石多有紀錄，有帝王下令刊刻者，如前述明成祖將明太祖〈嘉禾〉詩勒石摹本，賞賜諸王及大臣；明宣宗將自撰《祖德詩》九章刻石摹本賜楊士奇等近臣。明世宗時，地方多次進獻興獻王詩作，世宗均下令於從祐山建亭刻石，以彰孝思。<sup>139</sup>

臣下將賜詩刻石者亦多，如夏言得到明世宗賜詩，摹御筆於石以進；<sup>140</sup> 明神宗御書《勸學詩》賜太監孫隆，孫隆刻石於吳中。<sup>141</sup> 也有民間翻刻拓摹者，如梅純（成化十一年 (1481) 進士）《損齋備忘錄》記錄明宣宗六言詩〈過史館〉、〈上林春色〉謂：「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蓋石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sup>142</sup>

<sup>135</sup> 徐階等纂，《明世宗實錄》，卷 137，「嘉靖十一年四月己卯」條，頁 3221；「嘉靖十一年四月庚子」條，頁 3230；卷 151，「嘉靖十二年六月癸未」條，頁 3448。

<sup>136</sup> 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卷 84，「宣德八年冬十一月癸亥」條，頁 1942-1945。

<sup>137</sup>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收入林夕主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 1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清初鈔本），〈實錄〉，頁 331-332。

<sup>138</sup> 同前引，〈本朝制書〉，頁 325-330。

<sup>139</sup> 徐階等纂，《明世宗實錄》，卷 126，「嘉靖十年六月戊辰」條，頁 3014-3015；卷 128，「嘉靖十年七月壬子」條，頁 3045。

<sup>140</sup> 同前引，卷 155，「嘉靖十二年十月壬申」條，頁 384。

<sup>141</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乾集〉，卷上，〈神宗顯皇帝〉，頁 292。

<sup>142</sup> 梅純，《損齋備忘錄》，《叢書集成新編》第 8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說海》本），頁 624。

將皇帝的詩作刻石，主要是單篇或佳句，其目的在於表達珍視，若結合翻刻拓印，可以擴大接受的範圍及歷時性，傳播效益頗佳。

從讀者的角度觀察，庶民難有機會親見皇帝手澤墨寶，能得其詩作摹本，就如同睹見天顏，甚至可以說，皇帝詩歌摹本就是特殊文化、階級的象徵，所以皇帝詩歌摹本進入尋常百姓家，其傳播重點並不只在詩作內容美感的品讀，而是一種「圖像」式的閱讀與崇拜。

### (三) 史籍筆記別集的著錄

皇帝詩歌還有其他傳播途徑，如前文引述《明實錄》、《楚紀》等史籍，《三朝聖諭錄》、《宸章集錄》、《萬曆野獲編》等筆記，都記錄皇帝詩歌及相關史事。有些詩歌則是陸續發掘增補，如蒐羅宋濂、宋璉父子史料的《潛溪錄》，錄有明太祖〈御製詩二章〉、〈賜和宋濂韻〉、〈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等詩，多是明太祖詩集所未載，但此書是清宣統年間由丁立中、孫鏘所纂輯增補。<sup>143</sup>

史籍筆記所記錄皇帝詩歌，側重在史料功能，而非文學品賞，其記錄動機多有不同。或視為皇帝生活及國家大事的紀錄，如《明實錄》；或視為親身聞見，如楊士奇《三朝聖諭錄》；或作為家傳至寶，如《宸章集錄》；或作為言說評論之資，如《萬曆野獲編》等。其記錄的方式，有全詩著錄，有著錄詩事，或僅錄詩名，詳略不一。

皇帝詩歌也有入載於大臣別集而流傳，如解縉撰作〈嘉禾頌〉，詩前序文記錄明太祖親撰〈嘉禾〉詩賜予明成祖之事，謂：

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略。中言天賜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禋薦之重。末示謙沖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為可矜，而以為可懼，而思以自勉。<sup>144</sup>

詩序未詳錄〈嘉禾〉全詩，而是分就首、中、末三段勾勒全詩內容，所以記錄重點不在詩歌本文，而在於政治寓意，刻意凸顯明太祖對明成祖的「以民相託」，用以襄助明成祖取得權位的正統性，〈嘉禾〉詩因此深具權位轉移的象徵意義。

<sup>143</sup> 宋濂，《宋濂全集》，〈前言〉，頁3。

<sup>144</sup> 解縉，《文毅集》，卷2，〈嘉禾頌〉，頁614。

又如受到明世宗恩寵的嚴嵩，其《鈐山堂集》有〈賜御筆詩〉、〈恭和聖製中秋思母歌〉等詩，<sup>145</sup> 備述承恩之榮。諸詩多加詩序以載明時間、背景，如〈賜御筆詩〉詩題下署：「三月朔，滎澤渡河。御製七言絕一首，書賜五臣各一幅」，也保留皇帝詩作原題，如前述「中秋思母歌」。惟其著錄命意不在記錄文本，而是在展示自我應制、受賜的榮寵。以上史籍、筆記或別集中的皇帝詩作有詳有略，雖影響著皇帝詩歌傳播的完整性，但仍累積著不同讀者，增加多角度的閱讀意義與文獻價值。

#### (四) 詩選的選錄

較具文學品賞意義的傳播，是當代的詩選。但知名明詩選如俞憲 (1508-1572) 《盛明百家詩》、顧起綸《國雅》、陳子龍 (1608-1647) 《皇明詩選》、王夫之 (1619-1692) 《明詩評選》等，均未入錄明代皇帝的詩歌，其原因與皇帝威權崇高有關。清初沈德潛 (1673-1769) 選編《清詩別裁集》，在〈凡例〉有謂：

本朝御製詩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千百世當奉全集為準繩，非臣子所敢選也。錢牧齋選明高帝以下諸帝詩，失尊君之體。茲編不敢采入三聖御詩，別於牧齋選本。<sup>146</sup>

沈德潛針對錢謙益《列朝詩集》提出批評，認為人臣應推尊本朝皇帝全集，「非臣子所敢選」、「失尊君之體」二語，尤強調選評本朝皇帝詩歌應有分際。

在詩選中選錄皇帝詩歌原非禁忌，如漢高祖〈大風歌〉即常入錄各式詩選，但明代皇帝之詩尚未經過足夠時間沉澱，可能不宜與一般臣民之作並列等觀，特別是詩選在選取佳篇範式的同時，相對會有刊削及價值判斷，這些都會讓當世的編選者有所顧忌。問題是閱讀詩選的讀者，遠多於皇帝詩集的讀者，因此明代皇帝詩歌未能進入當世詩選，無疑減少了傳播機會，也難以進入當世的品評系統，得到就詩論詩的品論。

這種現象要到鼎革之際方有轉變，錢謙益《列朝詩集》基於保留國史文獻，蒐

<sup>145</sup> 嚴嵩，《鈐山堂集》，《故宮珍本叢刊》明代詩文別集第 526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卷 13，〈賜御筆詩〉，頁 225；卷 15，〈恭和聖製中秋思母歌〉，頁 237。

<sup>146</sup>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訂本），〈凡例〉，頁 1。

羅皇帝詩作列於首卷，意義十分深遠。其後張豫章（康熙二十七年（1688）進士）等奉清聖祖敕命編選《御選明詩》，<sup>147</sup> 規模內容均對此書有所繼承。此外朱彝尊《明詩綜》，收錄及品評明代皇帝詩作的觀點，有別於《列朝詩集》，二書並行不悖，傳播意義與效能相當顯著。<sup>148</sup>

### (五)稗官委巷之談

皇帝詩集民間不多見，反而是稗官小說、街巷流傳所在多有。錢謙益編選《列朝詩集》時謂：「臣謙益所撰集，謹恭錄內府所藏御製文集冠諸篇首，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其它稗官小說、委巷流傳及掇拾亂真者，皆削而弗取載焉。」<sup>149</sup> 錢謙益自謂《列朝詩集》收錄明代皇帝詩歌，係恭錄內府密藏御製文集，但未詳說管道。倒是「稗官小說、委巷流傳及掇拾亂真者」之語，可一窺鼎革之際明代皇帝詩歌在民間傳播的情況。

清初，朱彝尊編纂《明詩綜》，提到多部明代皇帝詩集失傳，如明成祖《御製集》：「藏棄天府，不傳人間。」明英宗《御製詩文》：「一冊，後附寶文圖書，〈春對〉、〈酒帘〉諸作，今亡。」並質疑明神宗《勸學詩》：「內府向藏御製詩文一卷，今已無存。《列朝詩集》所載《勸學詩》一章，未必出於御製也。」<sup>150</sup> 朱彝尊也記錄君臣唱和詩作缺乏保存，如明宣宗與群臣觀燈唱和：「景陵當海宇承平之日，肆意篇章，嘗於九年元夕，群臣觀燈，各獻詩賦，彙成六冊，惜今已無存。」明憲宗賜益莊王的〈四景連環詩〉：「益莊王《勿齋集》有〈恭次皇祖憲宗皇帝四景連環詩韻〉四首，則當時天藻曾頒諸藩服，惜乎今不得而見之矣。」<sup>151</sup>

皇帝詩集臣民罕見，除了攸關詩歌存佚，也產生真偽的問題。如王世貞曾考辨明太祖「鳥啼紅樹裡，人在翠微中」乃元順帝之作，明惠帝〈新月〉詩可能是元代「皇太子」阿裕爾實哩達喇的作品。<sup>152</sup> 朱孟震（隆慶二年（1568）進士）在《續玉筍詩談》亦謂：

<sup>147</sup> 張豫章，《御選明詩》，《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480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全書共一百二十卷，首卷為〈帝製〉，僅羅列詩作而無評論。

<sup>148</sup> 《列朝詩集》、《明詩綜》的編纂品評，參連文萍，〈追尋勝國貴胄——朱彝尊對明代皇族詩歌的編纂與評述〉，《興大人文學報》，47（臺中：2011），頁 1-30。

<sup>149</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乾集〉，卷上，〈太祖高皇帝〉，頁 284。

<sup>150</sup> 朱彝尊，《明詩綜》，卷 1 上，〈成祖文皇帝〉，頁 3；〈英宗睿皇帝〉，頁 15；〈神宗顯皇帝〉，頁 22。

<sup>151</sup> 同前引，〈宣宗章皇帝〉，頁 14；〈憲宗純皇帝〉，頁 16。

<sup>152</sup>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 20，頁 260。

曩毛尚書征安南，相傳世皇贈以詩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呂虔刀。」然不知為高皇送楊文詩也。……近有作《道聽錄》者，指黃巢〈詠菊〉、元梁王〈曉行〉之作，以為高皇；宋人譏高宗養鴿詩，載葉子奇《草木子》，而以為武宗北狩。書非異聞，時非久遠，尚謬妄若此，況遠且僻者哉。<sup>153</sup>

皇帝詩作真偽難辨，亦有張冠李戴、輾轉因襲，<sup>154</sup> 顯示皇帝詩歌的流傳頗見歧出舛誤。此外，前述詞臣代筆制度也影響皇帝詩作真偽，如黃佐質疑明武宗御製〈寫懷〉及〈蟠龍〉諸詩，「未敢必其果出於宸衷也」，<sup>155</sup> 其說雖屬猜測，仍可見皇帝詩歌傳播過程中，讀者對御筆與代筆頗有存疑。至如《典故紀聞》所載，明英宗正統年間，工部尚書吳中（1372-1442），喜聲色貨利，嘗領制誥，其妻質疑：「此文天子自為乎？儒臣代草乎？」答曰：「亦儒臣代草耳。」其妻曰：「代草甚當。今誦之終篇，何嘗有一清有一廉字？」<sup>156</sup> 藉以諷刺其夫居官不廉。此條記載並非針對御製詩歌，然可見民間對皇帝詩文是否出於御筆，是有所認識的，且被各取所需的進行解讀。

王世貞、朱孟震、錢謙益和朱彝尊都屬深於詩學的讀者，他們對明代皇帝詩歌抱持敬慎態度，留意真偽的考辨。但並非所有讀者都有同樣閱讀能力，如撰著《損齋備忘錄》的梅純，他是明太祖駙馬梅殷（洪武十一年（1379）尚寧國公主）的元孫，世隸勳籍，基於皇親國戚的感情，對先祖之詩多所留心，除記錄明宣宗六言詩的石刻摹本，還記錄明太祖〈詠雪〉詩，並推崇：「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又錄明太祖〈新雨〉詩，謂：「維新丕治，於是見焉，於惟盛哉」；引明太祖賜楊文（?-1406）南征之詩，謂：「氣象豪雄，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sup>157</sup> 梅純將先祖的詩歌與國家興治比附，評語迂闊誇大，已逾越單純的文學品賞。

數量更多的庶民，不一定識字知詩，他們對皇帝詩歌的接受，並非皆是憑藉文字，也來自口傳耳聞，或是詩歌本事軼聞，有的則僅是隻言片語，如明宣宗「野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多」二句傳誦人間，但全篇則已失傳。<sup>158</sup> 這些庶民閱讀皇帝詩

<sup>153</sup> 朱孟震，《續玉筍詩談》（臺北：廣文書局，1971），頁126-127。

<sup>154</sup> 明太祖〈詠菊花〉諸詩之爭議，可參蘇興，〈《千家詩》載明世宗《送毛伯溫》與《全明詩》收朱元璋《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的問題〉，《東北師大學報》，2（長春：1995），頁57-60。

<sup>155</sup> 黃佐，《翰林記》，卷16，〈賜御製詩文〉，頁211。

<sup>156</sup> 余繼登，《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1，頁199。

<sup>157</sup> 梅純，《損齋備忘錄》，頁624。

<sup>158</sup> 朱彝尊，《明詩綜》，卷1上，〈莊烈愍皇帝〉，頁24。

歌，實與珍奇軼聞無異，如王世貞所謂「天下誦之」，皇帝詩作以佳話軼聞的方式，成為公眾情志交流的一部分，因此真偽考辨、篇幅殘缺俱無關緊要。如此看來，皇帝權位優勢，雖能強制鈔刻詩集，並由內府藏奏，實則不能保障皇帝詩歌的傳之久遠，也不能保證詩作流傳的真確。若就另個角度而言，皇帝的威權與神祕性，使得民間樂於傳播皇帝詩歌及相關軼聞，某些詩作或詩句，因而得以突破宮廷禁苑的空間限制，傳誦於天下，也使得詩歌成為臣民窺探天顏的管道。

## 六、結論

明代皇帝詩歌及相關史料頗為散佚，本論文透過儘力蒐求，祈能一窺明代皇帝詩歌創作與傳播的概貌。雖然此議題尚可繼續深入論述，惟限於篇幅，僅以四端總結全文。

其一，多重的使用脈絡與意義。明代皇帝詩歌有私人背景、生活、品味的反映，如詠物詩可見宮廷物質文化，記錄疾病、親子互動、讀書觀畫、遊幸，乃至明思宗賜詩秦良玉的慨嘆，俱為帝王生活之紀實。然因多數皇帝囿居深宮，題材有限，內容缺乏開展，筆法亦見習套。而詩作特意彰顯君德治術、歌頌富麗昇平、展示帝王氣象，其呈現的個人情性與面貌仍十分片面。

由個人而家族，明代皇帝的詩歌創作還包括《祖德詩》隔代唱和、「嘉禾」詩等隔代的同題遞寫、宮廷節慶活動的頌讚、與宗藩詩歌互動等，可見詩歌在皇帝家族中具有多元的繫聯功能。

由家族而國政，皇帝詩歌具有隱微的政治意義，如明太祖詩歌寫入邊境生活的想像，反映國家創立初期在統治上的複雜性；明成祖海外刊立詩碑、明宣宗寫作使節往來的題材，顯示皇帝對外交事務的嘗試掌握；明宣宗以詩歌輔助政令，足以反映對農桑、賢才、治術的重視。

其二，傳統與現實的照會。明代立國，開展新局，時代不斷向前，思想則側重復古，以興復傳統來開展新局，明代皇帝詩歌正是此一思潮的體現。故其四言詩及樂府述作，追摹《詩經·雅頌》及古代聖王述作，意欲「追軼虞休，上媲姬美」。<sup>159</sup>五古、七古和律絕的寫作，亦以漢唐為師，抒發記錄個人情志與際遇。

若細究明代皇帝藉詩歌興復傳統，與民間士人仍有異同。追求再造詩歌盛世，

<sup>159</sup> 廖道南，《楚紀》，卷1，〈皇運內紀〉，頁318。

寄託情感上的認同與回歸，是上下共同的想望。而藉詩歌之擬寫自比古代聖君，甚至寄寓威權事功的自得自耀，則是帝王所專擅。是故明代少數有志於詩的皇帝，其所表現的創作意圖，兼有回歸傳統與照會現實，實則政治意涵與需求凌駕於詩歌的文學性。

其三，君臣唱和與國家文治的關係。皇帝樂詩，君臣詩歌唱和興盛，是國家文治的重要象徵。根據前文所述，明代君臣唱和至少呈現四個特點：一為唱和紀錄多集中少數皇帝，未能更加蔚然成風。一為皇帝多與親近重臣唱和，對象過於單一、少數。一為詩作僅能呈現君臣詩酒相得、水乳交融的一面，未能更見君王誅殺官吏冷酷無情的面向。一為詩作歌功頌德、記錄昇平，君臣權力關係凌駕詩歌的怨刺功能，詩作雍容虛美有餘，關照民生的託喻美刺作用有限。

何良俊 (1504-1573) 〈唐雅序〉曾取效《詩經》，並以唐太宗雅好篇章、廣泛與群臣唱和為例，對君臣唱和提出看法：「天子初不下堂，遂由此而覽知天下是非得失之故，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上下之間，但以微辭相感動而精神流通，雖最僻遠，若出一體。詩之為用，豈細故哉」。他揭櫫君臣唱和的理想，以為臣子「辭託婉諷，義存忠鯁」，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君主得以藉詩覽知關照天下。只可惜「世有謂詩者無益於治」，導致當時君臣唱和趨於止息，因此感嘆「天子在上，可無用詩，烏乎，茲豈然哉」。<sup>160</sup>

與前述四個特點聯繫，何良俊之說實非無的放矢。他身處嘉靖年間，對明世宗朝君臣唱和的實質內容與盛衰變化，特別是明世宗的怠墮昏亂，自是多有感慨。然綜觀有明一代，雅好詩道的皇帝多集中於明初，繼起的皇帝遠遜於「祖宗盛時」，<sup>161</sup>是則「世有謂詩者無益於治」，真是上下交關，影響著君臣對詩歌用世的取捨。從另個角度觀之，實與國運盛衰有所關聯，中、末世帝王威權和國家氣運俱趨於衰微，皇帝之詩不復多作，君臣唱和風氣不復興盛，自是難以支撐或粉飾恢宏的文治格局與氣象。

其四，政治傳播意義凌駕文學品賞。皇帝詩歌是明代詩學傳承遞嬗中的一員，其傳播管道主要有刊鈔、刻石、史籍筆記著錄、詩選選錄等。其傳播與接受的中間運作，包括受賜臣民、刊鈔者、摹印者、紀錄的人臣，及口耳相傳的士人庶民。其接受與閱讀的效果，不只側重文學性，尤在君德、國運、治術、帝王氣象等的省

<sup>160</sup> 何良俊，《何翰林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2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卷8，〈唐雅序〉，頁72-74。

<sup>161</sup> 黃佐，《翰林記》，卷6，〈燕飲賡和〉，頁77。



視，還有詩作真偽、軼聞奇談，或與御書墨寶結合作圖像式的閱讀。

這樣的傳播接受情境，透露出明代皇帝並非文壇的主導力量，難以真正帶領創作風氣，他們的詩歌是地位權勢的象徵，不適用於進入當代的文學品評系統，被批評家刊削撿擇，所以現存相關閱讀紀錄中，臣服於君主威勢而歌頌誇讚者居多，客觀評論者少。即使明清之際的詩選，明代皇帝詩歌仍被視為前朝遺物，以詩為史，多受追念緬懷。而時移至今，明代皇帝面臨不同的傳播局面，他們必須向時間、向新一代的讀者「俯首稱臣」，與士人庶民之詩共同經歷淘洗與篩選，方能尋求立言不朽的機會。

（責任校對：李奇鴻）

附錄：明代皇帝詩文典藏及著錄簡表

作者	書名	典藏或著錄	版本
明太祖 朱元璋	高皇帝御製文集 20 卷	明太祖集 點校後記	明嘉靖八年唐胄雲南刊本
	高皇帝御製文集 20 卷	國家圖書館	明嘉靖十四年徐九臯江都刊本
	高皇帝御製文集 20 卷	國家圖書館	明萬曆十年姚士觀校刊本
	高皇帝御製文集 20 卷	國家圖書館	明萬曆間南京禮部刊本
	高皇帝御製文集 20 卷	國家圖書館	明謝正蒙熊尚文訂刊本
	明太祖文集 20 卷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太祖集 20 卷		黃山書社 1991 年排印本（胡士萇點校）
	高皇帝文集 20 卷，又高皇帝文集 30 卷、詩集 5 卷	國史經籍志	未著版本
	御製文集 5 卷	列朝詩集小傳	明洪武初年宋濂等編錄本
	御製詩集	絳雲樓書目	未著版本
	明太祖文集 50 卷、詩集 5 卷	明史藝文志	未著版本
	御製詩集 5 卷	明詩綜	未著版本
明成祖 朱棣	太祖文集 30 卷（甲集 2 卷；乙集 3 卷；丙集文 14、詩 1 卷；丁集 10 卷），又御製文集類編 12 卷、詩集 5 卷、御製書稿 3 卷	千頃堂書目	未著版本
	大明太宗皇帝御製集 4 卷（存 2 卷）		明內府寫本（海南出版社影入故宮珍本叢刊）
	御製集	列朝詩集小傳	未著版本
	御製集	明詩綜	未著版本
明仁宗 朱高熾	成祖文皇帝御製文集	千頃堂書目	未著版本
	御製詩集 2 卷	國家圖書館	明洪熙元年內府刊本
	御製集 2 卷	列朝詩集小傳	未著版本
	仁宗皇帝文集 20 卷、詩集 2 卷	國史經籍志	未著版本
	仁宗文集 20 卷、詩集 2 卷	明史藝文志	未著版本
	御製文集 20 卷、詩集 2 卷	明詩綜	未著版本
仁宗昭皇帝御製文集 20 卷、詩集 2 卷	千頃堂書目	未著版本	

作者	書名	典藏或著錄	版本
明宣宗 朱瞻基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 44 卷 (存 24 卷)	國家圖書館	明內府朱絲欄鈔本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 44 卷 (存 26 卷)	(北京)國家 圖書館	明內府鈔本(莊嚴文化出版公司 影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宣宗皇帝御製詩 1 卷	國家圖書館	明藍格鈔本
	宣宗皇帝御製詩 1 卷	國家圖書館	明萬曆丁巳江西巡按陳于庭紀錄 彙編刊本(藝文印書館影印)
	宣宗皇帝御製詩 1 卷	國家圖書館	明刊本
	宣宗皇帝御製詩 1 卷	國家圖書館	明刊鄧士龍重編國朝典故卷 27 收錄
	祖德詩 9 章		明宣宗實錄卷 84「宣德 6 年 11 月癸亥」條收錄
	宣宗皇帝文集 44 卷、詩集 6 卷	國史經籍志	未著版本
	御製詩、祖德詩(世宗和 韻)	絳雲樓書目	未著版本
	宣宗文集 44 卷、詩集 6 卷 、樂府 1 卷	明史藝文志	未著版本
	御製文集 44 卷、詩集 6 卷	明詩綜	未著版本
	宣宗章皇帝御製文集 44 卷 、詩集 6 卷、樂府 1 卷、御 製祖德詩 1 卷(世宗和韻)	千頃堂書目	未著版本
明英宗 朱祁鎮	御製詩文 1 卷	明詩綜	未著版本
	英宗睿皇帝御製詩文 1 卷	千頃堂書目	未著版本
明憲宗 朱見深	憲宗皇帝詩集 4 卷	國史經籍志	未著版本
	憲宗詩集 4 卷	明史藝文志	未著版本
	御製詩集 4 卷	明詩綜	未著版本
	憲宗純皇帝御製詩集 4 卷	千頃堂書目	未著版本
明孝宗 朱祐樞	孝宗詩集 5 卷	明史藝文志	未著版本
明世宗 朱厚熜	輔臣贊和詩集 1 卷	南京圖書館	清鈔本(莊嚴文化出版公司影入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御製詩賦錄 1 卷	京都大學人文 科學研究所	萬曆三十七年刊張璠論對錄附錄
	翊學詩 1 卷、詠春同德錄 1 卷、宸翰錄 1 卷、白鵲贊和 錄 1 卷、詠和錄 1 卷	國史經籍志	未著版本

作者	書名	典藏或著錄	版本
明世宗 朱厚熹	御製詩賦集	絳雲樓書目	未著版本
	翊學詩 1 卷、宸翰錄 1 卷、詠和錄 1 卷、詠春同德錄 1 卷、白鵲贊和錄 1 卷	明史藝文志	未著版本
	御製詩賦集 7 卷、翊學詩 1 冊	明詩綜	未著版本
	世宗肅皇帝御製詩文集 7 卷、翊學詩 1 卷、宸翰錄 1 卷、輔臣贊和詩集 1 卷、詠和錄 1 卷、詠春同德錄 1 卷、白鵲贊和錄 1 卷	千頃堂書目	未著版本
明神宗 朱翊鈞	勸學詩 1 章	列朝詩集小傳	未著版本
	勸學詩 1 卷	明史藝文志	未著版本
	神宗顯皇帝御製詩文 1 卷	千頃堂書目	未著版本
附：興獻王 睿宗朱祐杭	含春堂稿、恩紀詩集		明嘉靖五年司禮監重刊本（海南出版社影入故宮珍本叢刊）
	睿宗皇帝恩紀詩集 7 卷、含春堂稿 1 卷	國史經籍志	未著版本
	含春堂集、恩紀詩集	列朝詩集小傳	明嘉靖五年司禮監重刊本
	興獻皇帝含春堂稿 1 卷、恩紀詩集 7 卷	千頃堂書目	明嘉靖五年司禮監刊本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萬曆起居注》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明末鈔本及民國鈔本。
-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十三經注疏》本。
- 王士驥，《中弇山人稿》，《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明萬曆刻本。
-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0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尹直，《齋齋瑣綴錄》，《叢書集成新編》第8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歷代小史》本。
- \*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太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1。
- 朱孟震，《續玉筍詩談》，臺北：廣文書局，1971。
- 朱祐杭，《恩紀詩集》，《故宮珍本叢刊》明代詩文別集第531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 朱厚燧，《輔臣贊和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2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清鈔本。
- \* 朱高熾，《御製詩集》，國家圖書館藏明洪熙元年(1425)內府刻本。
- 朱誠泳，《小鳴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朱謀瑋，《藩獻記》，《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19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明萬曆刻本。
- \* 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明內府鈔本。
- \* 朱彝尊，《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70。
- 宋濂撰，羅月霞編，《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余繼登，《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訂本。

- 李東陽撰，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
- 李延壽等纂，《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
- 吳 寬，《家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何良俊，《何翰林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42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明嘉靖四十四年 (1565) 刻本。
- 徐 階等纂，《明世宗實錄》，收入董倫等纂編，《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明刊本。
- 徐學聚，《國朝典彙》，《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64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明天啟四年 (1624) 刻本。
- 陳 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陳洪謨，《治世餘聞》，北京：中華書局，2007。
- 郭子章，《豫章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73。
-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梅 純，《損齋備忘錄》，《叢書集成新編》第 8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說海》本。
- \* 張廷玉等纂，《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
- 張 璉，《論對錄》，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明萬曆三十七年 (1609) 刻本。
- 張豫章，《御選明詩》，《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480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黃 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 費 宏，《宸章集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92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明藍格鈔本。
- 解 縉，《文毅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楊士奇，《三朝聖諭錄》，收入霍韜輯，《明良集六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47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明嘉靖十二年 (1533) 刻本。
- 楊士奇等纂，《明宣宗實錄》，收入董倫等纂編，《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明刊本。
- 廖道南，《楚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48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影印明嘉靖二十五年 (1546) 何城李桂刻本。
- \_\_\_\_\_，《殿閣詞林記》，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 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

- \* \_\_\_\_\_, 《列朝詩集》, 《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22 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清順治九年 (1652) 汲古閣刻本。
- \_\_\_\_\_, 《絳雲樓書目》, 收入林夕主編, 《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 第 12 冊,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5, 清初鈔本。
- 劉若愚, 《酌中志》,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1。
- 劉健等纂, 《明孝宗實錄》, 收入董倫等纂編, 《明實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6, 明刊本。
- 蹇義等纂修, 《明仁宗實錄》, 收入董倫等纂編, 《明實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6, 明刊本。
- 嚴嵩, 《鈐山堂集》, 《故宮珍本叢刊》明代詩文別集第 526 冊,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0。
- 顧秉謙等纂, 《明神宗實錄》, 收入董倫等纂編, 《明實錄》,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6, 明刊本。

## 二、近人論著

- 郭萬金, 〈明代文學生態與帝王的詩歌態度〉, 《求是學刊》, 36.4, 哈爾濱: 2009, 頁 112-117。
- 連文萍,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政大中文學報》, 12, 臺北: 2009, 頁 231-260。
- \_\_\_\_\_, 〈明代皇族的《尚書》教習〉, 《書目季刊》, 45.2, 臺北: 2011, 頁 1-19。
- \_\_\_\_\_, 〈明神宗與《詩經》講習〉, 《國文學報》, 49, 臺北: 2011, 頁 65-86。
- \* \_\_\_\_\_, 〈追尋勝國貴胄——朱彝尊對明代皇族詩歌的編纂與評述〉, 《興大人文學報》, 47, 臺中: 2011, 頁 1-30。
- \_\_\_\_\_, 〈明代皇族的詩歌教習及其意義〉, 《高師大國文學報》, 22, 高雄: 2015, 頁 1-28。
- \_\_\_\_\_, 《詩學正蒙——明代詩歌啟蒙教習研究》, 臺北: 里仁書局, 2015。
- 趙中男, 〈宮廷詩人朱瞻基的作品及其藝術成就〉, 《湖南科技學院學報》, 27.1, 永州: 2006, 頁 76-81。
- 劉秀紅, 《明宣宗與宣德詩壇研究》, 長沙: 中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2008。
- 蘇興, 〈《千家詩》載明世宗《送毛伯溫》與《全明詩》收朱元璋《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的問題〉, 《東北師大學報》, 2, 長春: 1995, 頁 57-60。

(說明: 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Fei, Hong. *Chenzhang Jilu (Chen Zhang Collections),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Collection of Listed Titles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Jibu vol. 292. Tainan: Solemn Culture, 1996. Codex of the Ming dynasty.
- Lien, Wen-ping. "Zhuixun Shengguo Guizhou: Zhu Yizun dui Mingdai Huangzu Shige de Bianzuan yu Pingshu (Tracing to the Previous Aristocrat in the Glorious Dynasty: Zhu Yizun's Compilation and Comments on the Poetry of the Imperial Kinsmen of the Ming Dynasty)," *Xingda Renwen Xuebao (Chung Hsi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47, 2011, pp. 1-30.
- Qian, Qianyi. *Leichao Shiji (The Poetry of Dynasties), Xuxiu Siku Quanshu (Sequel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s in Four Treasuries)*, Jibu vol. 1622.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Jigu Ge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1652).
- Zhang, Tingyu et al. (eds.). *Ming Shi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Ting Wen Press, 1979.
- Zhu, Gaochi. *Yuzhi Shji (The Imperial Poetry)*. Imperial manuscript copy edition in 1425 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 Zhu, Houzong. *Fuchen Zanhe Shiji (The Poetry of the Royal Courtiers Tribute to Peace),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Collection of Listed Titles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Jibu vol. 302. Tainan: Solemn Culture, 1997. Manuscript of the Qing dynasty.
- Zhu, Yizun. *Ming Shi Zong (Poetry Compil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The World Book, 1970.
- Zhu, Yuanzhang. *Ming Taizu Wenji (Collected Works by Ming Taizu), Jingyin Wenyuan Ge Siku Quanshu (The Complete Collections in Four Treasuries from Wenyuan Pavilion)*, vol. 1223.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 Zhu, Zhanji. *Daming Xuanzong Huangdi Yuzhi Ji (The Imperial Collected Works of Xuande Emperor in the Ming Dynasty),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Collection of Listed Titles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Jibu vol. 24. Tainan: Solemn Culture, 1996. Imperial manuscript copy in Ming dynasty.



##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ing Imperial Poetry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Poems of Taizu, Renzong, Xuanzong and Shizong**

**Lien, Wen-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ping@scu.edu.tw

### **ABSTRACT**

Most Ming emperors composed poetry, but their poetic interests and degrees of understanding differe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etry of Ming emperors, as well as related historical source materials, in an effort to uncover its various applications regarding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palace festivals, imperi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affairs. Ming emperors wrote poetry to display their virtue and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composed four-character and Yuefu poetry in an effort to imitate both the *Shijing* and the literary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earlier emperors. They also penned old-style poems and quatrains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s and aspirations. However, not only did their residence at court limit the range of topics found in their poetry, they moreover deliberately used poetry to glorify the nation and the imperial image, which resulted in a poetic output that was fixed in form and monotonous in content. During the Ming, imperial poetry was disseminated to the public via handwritten copies, stone inscriptions, descriptive notes, anthology extracts, and novels written by officials. Despite such diverse means of dissemination, a large amount of imperial poetry has been lost or adulterated. Yet, regardless of its authenticity or literary quality,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nonetheless read the emperor's poetry not only for interesting anecdotes, but also to attain a glimpse into the emperor's character.

**Key words:** the emperor, the imperial court, poetry, poetics, textual dissemination, the Ming dynasty

(收稿日期：2014. 8. 5；修正稿日期：2015. 1. 6；通過刊登日期：2015. 5. 26)

